

## 干預主義對自由放任主義： 孰是孰非？

謝立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

**摘要** 在“大蕭條”的解釋和應對方面，“消費不足論”的確不是唯一的理論話語；在“消費不足論”之外的確存在著其他一些理論話語，如“投資不足論”、“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等，這些話語系統之間在對“大蕭條”及干預主義的起源和應對策略方面的確有著不同的說法；而本文的分析表明：無論是從經驗事實、從邏輯推理，還是從語義分析方面看，對於這些不同說法之間的真假、對錯，我們的確並無可靠的途徑與方式來加以終極性的甄別和判斷。因此，至少在目前，就發展戰略而言，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似乎就是：怎樣都行。對此唯一需要加以補充的一點就是：只要絕大多數人民對這一發展戰略表示同意，並在分享這一發展戰略可能為自己帶來的各種利益的同時，也願意承擔由這一發展戰略可能帶來的任何風險和痛苦。

在《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sup>1</sup>一文中，我們試圖說明羅斯福及其支持者們對羅斯福“新政”一類干預主義政策起源的解釋並不必然成立：1929-1939年“大蕭條”一類的經濟危機，並不一定像主流話語所說的那樣，是以自由放任為原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胡佛總統在應對大蕭條方面所遭遇的失敗，也不一定像主流話語所宣稱的那樣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失敗；羅斯福總統所實施的那些干預



主義政策在應對大蕭條方面也不像主流話語所說的那樣成功：所謂“1929–1939年的大蕭條是以自由放任為原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必然結果，只有通過羅斯福新政一類的干預主義措施才能夠緩解或消除週期性的經濟蕭條”之類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及其支持者們在“消費不足論”這種特定話語系統的引導和約束下，對“經驗事實”、“解釋邏輯”和相關概念的含義做出特定選擇之後所得出的結果；只有以這樣一些在經驗事實、解釋邏輯和概念含義方面所做的特定選擇為基礎，羅斯福等人對“新政”一類干預主義政策的起源所做的解釋、或對干預主義政策所做的辯護才能夠成立；否則，人們就完全可以對這些解釋、這些辯護加以質疑。

但上文的分析也留下一個疑問，這就是：這些分析充其量也不過是說明了羅斯福等干預主義者的言行的確是受到了“消費不足論”這一話語系統的影響和約束而已，而並不能證明羅斯福等人在這一話語系統的引導和約束下對“大蕭條”起因所做的分析及結論（“從自由放任主義向干預主義的戰略轉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或不能成立的；假如人們能夠證明在“大蕭條”的解釋和應對方面“消費不足論”是唯一正確、可取的理論話語，那麼羅斯福等人在這一話語的引導和約束下對“大蕭條”起因和對策所做的分析及結論（包括他們在不同的“經驗事實”、“解釋邏輯”和“概念含義”當中所做的那些特定選擇）也就應當是唯一正確的、可取的，儘管它在細節上可能會存在一些問題；其他人對“大蕭條”起因和對策所做的分析及結論（也包括他們在不同的“經驗事實”、“解釋邏輯”和“概念含義”當中所做的那些特定選擇）就應當是錯誤的、不可取的。因此，僅僅指出羅斯福及其支持者們在對“大蕭條”的起因和對策進行分析是受到了這一話語的引導和約束，並不足以證明上文想要說明的那個觀點，即：“從自由放任主義向干預主義



的戰略轉型並非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而是一種話語的建構”。除非我們能夠進一步證明在“大蕭條”的解釋和應對方面“消費不足論”不是唯一正確、可取的理論話語，除了“消費不足論”之外，尚有或完全可以有其他一些理論話語存在，這些理論話語不僅在對“大蕭條”及干預主義的起源方面有著十分不同的說法，而且對於這些不同說法之間的真假、對錯，我們並無可靠的途徑與方式來加以終極性的甄別和判斷——否則我們在上文中所做的說明就是不充分的。

本文所做的分析正是要解決上面遺留的這樣一個問題。考察相關文獻，我們可以看到，在對包括“大蕭條”在內的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進行解釋和應對方面，至少存在著四種不同的經典理論系統：以卡欽斯等人為代表從西斯蒙第延續來的“消費不足論”，以凱恩斯和漢森等人為代表的“投資不足論”，以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等人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以及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其他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視為這幾種理論系統的混合或雜交。根據本文討論的需要，這四種經典理論系統又可以進一步概括為由“消費不足論”和“投資不足論”構成的干預主義和由“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構成的自由主義兩大基本取向。那麼，我們到底該怎樣來看待這些不同的理論系統或取向呢？在這些不同的理論系統當中，到底哪一種更為合理或更為可取呢？

正像我們在《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一文中分析羅斯福“新政合理性證明”時所指出過的那樣，所有這幾種理論系統，無論是屬於干預主義還是屬於自由主義，在內容或結構上都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大蕭條”等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發生之原因的解釋和論證，二是對這類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加以應對的策略方案的闡釋和論證。因此，和《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一文中所做的



那樣，我們也不妨從這兩個方面入手來對上述幾種理論系統的合理性或可取性進行討論。

## 一 蕭條發生原因之解釋的合理性

首先我們來看上述各種理論當中，哪種理論系統對於“大蕭條”等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發生之原因的解釋和論證相對而言更為合理或者可取？

如前所述，在對“大蕭條”等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進行解釋時，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話語系統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各種類型的干預主義話語都把引發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歸於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本身包含的某種內在因素（消費不足、或投資不足等，可以概括為需求不足），各種類型的自由主義話語則都把引發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都歸於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以外的某種因素（銀行信用的擴張，或者美聯儲一類政府機構貨幣政策的失誤等）。具體點說，對於干預主義話語而言，現代經濟危機之所以會週期性爆發，是因為自由放任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包含的一些弊病會造成（消費或投資）需求不足，導致供求失衡，最終引發經濟崩潰。這裏的因果關係是：自由放任主義-需求不足-經濟崩潰。而對於自由主義話語來說，現代經濟危機之所以會週期性發生，則是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之外的某些力量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運作形成了週期的干擾，導致經濟均衡運作所需要的條件被破壞，最終引發經濟崩潰。這裏的因果關係是：市場外部力量對市場經濟形成干擾-經濟運行失衡-經濟崩潰。因此，參照我們前面對“消費不足論”所做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話語系統在經濟危機原因方面所做解釋得以成立所必須進行的證明工作概述如下：





對於干預主義而言，爲了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經濟崩潰“真的”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必然後果，他們就必須：(1) 找到一些經驗事實來表明在歷次經濟崩潰發生之前確實出現了“需求不足”的現象；(2) 從理論上說明“需求不足”現象與歷次“經濟崩潰”的發生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無法否認的邏輯聯繫；以及(3) 從理論邏輯和經驗事實兩個層面證明這種引發了經濟崩潰的“需求不足”現象的確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結果。如果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得不到確認，那麼干預主義者對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產生原因的解釋就無法得到確認。

類似地，對於自由主義而言，爲了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經濟崩潰“真的”是某種市場外部力量（而不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本身）的必然後果，他們也必須：(1) 找到一些經驗事實來表明在歷次經濟崩潰發生之前確實出現或存在被認爲干擾了市場經濟體系運作的這種外部因素；(2) 從理論上說明這種外部因素與歷次“經濟崩潰”的發生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無法否認的邏輯聯繫；以及(3) 從理論邏輯和經驗事實兩個層面證明這種引發了經濟崩潰的相關外部因素的確不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結果。如果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得不到確認，那麼自由主義者對週期性現代經濟危機產生原因的解釋也就無法得到確認。

我們現在來對上述話語系統得以成立所需要的條件及其具備狀況分別做一簡要考察。

首先，我們來看看，被上述各種話語宣稱引發了經濟危機的各種現象在歷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是否確實存在？

盧卡斯 (Lucas)、阿貝爾 (Abel) 和伯南克 (Bernanke) 等人在對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週期進行了調查之後，總結了有關經濟週期的一些“典型事實”。如下表所示：<sup>2</sup>



表1：經濟週期的“典型事實”

變數	方向	時序
<b>生產</b>		
工業生產	順週期的	重合的
<b>支出</b>		
消費	順週期的	重合的
經濟固定投資	順週期的	重合的
住宅投資	順週期的	領先的
存貨投資	順週期的	領先的
政府購買	順週期的	不確定的
<b>勞動市場的變數</b>		
就業	順週期的	重合的
失業	逆週期的	沒有明確模式的
平均勞動生產率	順週期的	領先的
實際工資	順週期的	不確定的
<b>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b>		
貨幣供應量	順週期的	領先的
通貨膨脹	順週期的	滯後的
<b>金融變數</b>		
股票價格	順週期的	領先的
名義利率	順週期的	滯後的
實際利率	非週期的	不確定的

上表列舉了比較公認的經濟週期中最爲關鍵的一些“基本事實”或“典型事實”，並按照它們與GDP運動相關的方向和時序對它們進行分類：就方向而言，凡是在經濟週期中運動方向與GDP運動方向一致的變數被歸爲“順週期的”，反之則被歸爲“逆週期的”；就時序而言，凡是在GDP變化之前就發生變化的變數被歸爲“領先的”，跟隨在GDP之後發生變化的變數被歸爲“滯後的”，與GDP同時發生變化的變數被歸爲“重合的”，其他則可能是“不確定的”或“沒有明晰模式的”。從表中可以



看到，上述四種理論系統所提用來解釋經濟週期現象的關鍵因素（“消費”、“投資”、“貨幣變數”等）其變化態勢（“方向”、“時序”）均與GDP的變化態勢高度一致。這似乎表明，在對有據可查的絕大多數經濟週期進行解釋方面，上述四種學說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所需“事實”依據的支持。在這一點上，不僅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之間難分伯仲，而且自由主義內部的不同學派之間，或者干預主義內部的不同學派之間也無分高低。

不過，也有人認為，上述四種理論系統所提用來解釋經濟週期現象的諸因素在時序方面與GDP運動之間的關係還是有著較大的差異：相對消費和經濟固定投資而言，“存貨投資”和“貨幣供應量”在時序方面相對GDP的運動具有“領先性”。按照統計學中的因果分析原理，這表明它們更有可能被歸結為引致GDP運動週期性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假如這種觀點可以被接受的話，那就表明“消費不足”論應該被排除在我們可接受的理論系統名單之外。不過，即使如此，這也無法幫助我們解決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在“存貨投資”和“貨幣供應量”這兩個因素當中，由於它們一個是屬於干預主義者所提用來解釋經濟週期的主要因素，另一個屬於自由主義者所提用來解釋經濟週期的主要因素，因此，由它們所反映出來的“事實”依然無法幫助我們判斷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孰是孰非。

如果我們單獨考察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情況，結果也與此類似。

例如，雖然有一些人如小福爾索姆、漢森、庫茲涅茨等所提供的資料向我們明確地否定了1929年大蕭條之前存在著“消費不足”現象。但同樣按照庫茲涅茨所提供的資料，我們卻可以發現，消費支出的變動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確實存在著較高的相關度。表2提供了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年度資料。從表中的資料以及根據



表中資料繪製而成的圖1，我們可以看到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度變動（或國民收入的年度變動）情況和消費支出的年度變動情況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或一致性（除了1922年這一個時間點之外，在所有其他年份上，當消費支出上升時，國民生產總值也就上升；消費支出下降，國民生產總值也就下降；消費支出上升或下降幅度大的年份，國民生產總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相應也大；反之，相應也小。）在一定程度上，這似乎可以用來表明消費不足論的可信性。

表2：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消費支出狀況（百萬美元）<sup>3</sup>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GNP	68750	82835	66148	67186	78214	78791	83413	88780	86778	90053	93640	82723	64751	47202	46538	55765	61243
消費支出	49409	60736	54660	53904	60015	63546	64202	69743	68570	72229	73342	69061	56288	44055	42270	49704	52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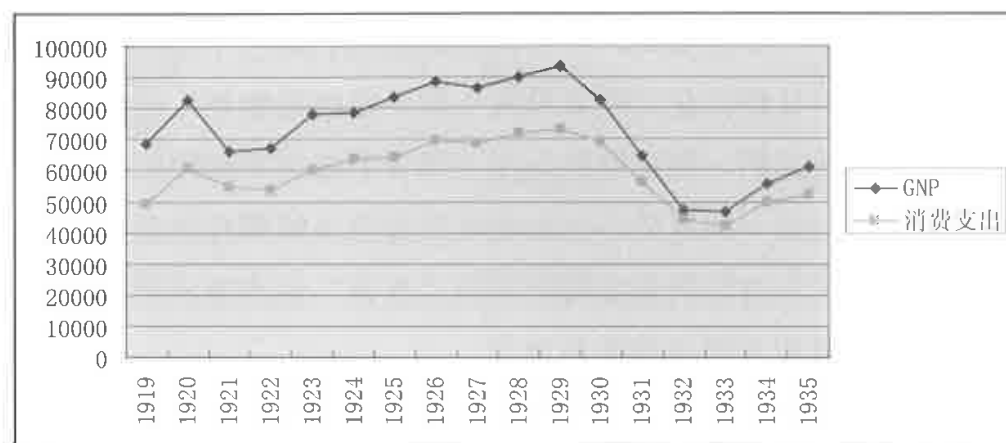


圖1：1919–1935年間美國GNP和消費支出走勢

同樣按照庫茲涅茨所提供的資料，我們也可以發現1929年至1935年間美國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的變動與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也確實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或一致性。表3提供了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資本形成的年度資料。從表中的資料以及根據表中資料繪製而成的圖2，



我們可以看到1919年至1935年16個年份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或國民收入的變動）和資本形成的變動兩者之間也的確高度相關或一致：除了1924年（資本形成下降而GNP則繼續上升）、1926年（資本形成有所下降但GNP繼續上升）、1928年（資本形成下降但GNP上升）、1933年（資本形成有所上升而GNP則有所下降）四個年份外，在其他年份上，也是當資本形成上升時，國民生產總值也就上升；資本形成下降，國民生產總值也就下降；資本形成上升或下降幅度大的年份，國民生產總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相應也大；反之，相應也小。這似乎可以表明，投資需求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確可以用來解釋像GNP一類的經濟總量的變化。

表3：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和總資本形成（GCF）狀況  
（百萬美元）<sup>4</sup>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GNP	68750	82835	66148	67186	78214	78791	83413	88780	86778	90053	93640	82723	64751	47202	46538	55765	61243
GCF	19341	22100	11488	13282	18199	15245	19211	19037	18208	17824	20298	13662	8464	3147	4268	6061	9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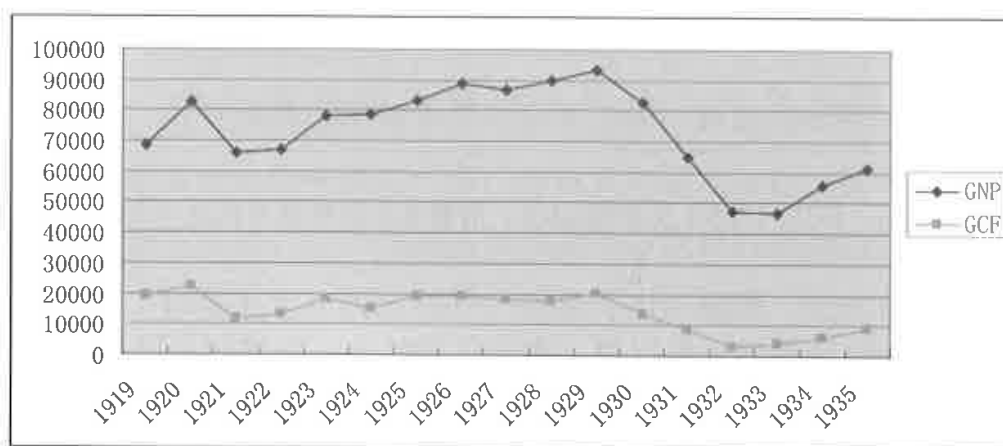


圖2：1919–1935年間美國GNP和總資本形成走勢

不過，對比圖1和圖2，我們會發現，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度變動狀況與消費支出年度變動狀況之間的





一致性，比與資本形成年度變動狀況之間的一致性，似乎要更高一些。圖3把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度變動狀況與消費支出變動狀況、資本形成變動狀況之間在一致性方面的細微差異更直觀地表達了出來。觀察圖3，我們可以發現，國民生產總值和消費支出的年度變化趨勢之間只有在1922年這一個時間點上出現了不一致（消費支出下降而GNP卻繼續呈上升之勢），而國民生產總值和資本形成的年度變化趨勢之間卻在1924年（資本形成大幅下降但GNP卻略有上升）、1926年（資本形成略有下降但GNP卻大幅上升）、1928年（資本形成有所下降但GNP卻有所上升）三個時間點上呈現出了不一致的情況。我們該如何來解釋這樣一種雖然細微但卻不應被忽略的差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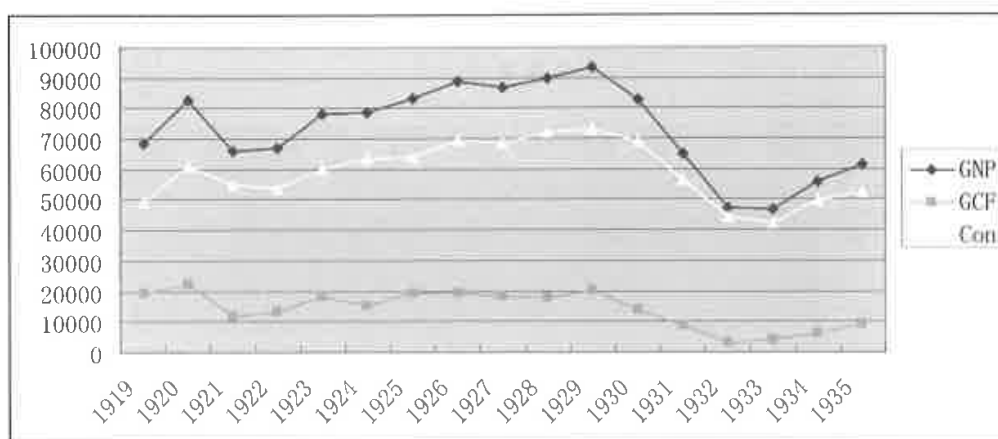


圖3：1919-1935年間美國GNP、消費支出和總資本形成走勢

按照統計學的一般原理，從上述差異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與國民生產總值和資本形成年度變化趨勢之間的關係相比，國民生產總值和消費支出年度變化趨勢之間呈現出來的相對更高程度的一致性，表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波動在相對更大的程度上是由消費支出的變化所決定的，而只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程度上受資本形成狀況變化的影響。分別計算各年度資本



形成和消費支出兩組資料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相關係數，也可以發現相同的結論：1919年-1935年間，美國各年度資本形成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8965，而消費支出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相關係數則為0.9621。後者明顯高於前者。假如這一結論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消費不足論”似乎就更進一步地獲得了經驗事實的支持。

然而，同樣以庫茲涅茨提供的上述數據資料為依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漢森卻得出了與上述完全不同的一種結論。在其名著《財政政策和經濟週期》一書中，漢森以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為指引，提出了這樣一種獨特的看法，即：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的年度波動趨勢與消費支出的年度波動趨勢之間出現的上述差異，主要原因在於投資需求的變化往往先於消費支出的變化，或者說，消費支出的變化往往滯後於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的變化。

漢森指出，儘管在每一次的經濟波動當中，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都會發生相應的波動，但從時間角度來看，在這兩者當中，投資需求的波動一般說來總是要先於消費需求的波動。漢森寫到：“考慮到時間因素，那麼很明顯，儘管投資和消費總是一起波動，但它們的運動並非是完全同步的。庫茲涅茨提供的資料顯示，投資總是趨於領先一步，而消費則隨之而行。例如，1921年的經濟復蘇就是始於投資支出的擴張。從1921年到1922年總投資增加了18億美元，與此同時，消費支出卻繼續（雖然是以一種有所降低的速率）下降了7億美元。在隨後的幾年裏兩者則一起呈現出強烈的上升運動。同樣，在30年代的經濟復蘇過程中，投資也是率先啟動，從1932年至1933年增加了7億美元，而與此同時消費則依然下降了18億美元。在1929年的經濟崩潰過程中，投資和消費雖然同時呈下跌趨勢，但我們還是應該注意到這樣的事實，



即：從1929年到1930年，投資支出呈呼嘯直下之勢，而消費支出則只呈現一種相對較小的收縮。這表明即使在經濟收縮過程中消費的收縮也是跟隨在投資的收縮之後。”<sup>5</sup>

漢森還寫到：“投資相對於消費的領先性不僅可以從宏觀商業週期的轉捩點中找到蹤跡，而且也可以在微觀商業循環中找到證據。例如，1923至1924年間存在過一次微小的經濟收縮，這次收縮主要只是通過投資方面的衰退顯示出來，消費方面卻繼續著保持上升的態勢（儘管是在一種降低了的速率上）。在隨後的1925年裏投資跳躍著上升，而消費則上升了一點點，顯示出了消費的滯後性。在下一年（從1925–1926年）投資繼續維持在已經達到的較高水準上，而消費（在前一年上升的投資的刺激之下）則呈現出強烈的向前運動之勢。消費再一次呈現出緊跟投資的態勢。自此至1929年，兩者都保持了較高的增長態勢（1928年投資略有下降）。”<sup>6</sup>

據此，漢森總結到：“近20年的統計資料趨於支援以下命題，即：投資是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主動因素，消費則只扮演了一種被動的、滯後的角色。”<sup>7</sup>

顯然，假如漢森的上述分析是可以被接受的，那麼，1919–1935年間美國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年度變化趨勢與消費支出年度變化趨勢之間差異的意義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那樣，這一差異本是一件看上去對“消費不足論”相對有利而對“投資不足論”相對不利的“事實”。然而，現在，經過漢森上述這一番解釋之後，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不僅不再顯得與“投資不足論”有所唐突，反而還成了“投資不足論”的有力證據。<sup>8</sup>

在《美國大蕭條》一書中，羅斯巴德則提供了一套可以證明1921–1929年間美國信貸漲縮與經濟漲縮之間存在高度一致性的數據資料。詳見表4：



表4：美國1921–1929年貨幣供給總量（單位：10億美元）<sup>9</sup>

日期 年/月/日	銀行 外通 貨 <sup>1</sup>	調整後 的活期 存款	定期 存款	調整後 的存款 總額 <sup>2</sup>	儲蓄和 貸款 資本 <sup>3</sup>	人壽保 險保單 淨資本	貨幣 供給 總量 <sup>4</sup>	每年較前1年 的變動幅度 (%)
1921/6/30	3.68	17.11	16.58	37.79	1.85	5.66	45.30	-
1922/6/30	3.35	18.04	17.44	39.00	2.08	6.08	47.16	4.1
1923/6/30	3.74	18.96	19.72	42.75	2.42	6.62	51.79	9.8
1923/12/31	3.73	19.14	20.38	43.50	2.63	6.93	53.06	4.9
1924/6/30	3.65	19.41	21.26	44.51	2.89	7.27	54.67	6.1
1924/12/31	3.70	20.90	22.23	47.08	3.15	7.62	57.85	11.6
1925/6/30	3.57	21.38	23.19	48.32	3.48	8.06	59.86	7.1
1925/12/31	3.77	22.29	23.92	50.30	3.81	8.48	62.59	9.2
1926/6/30	3.60	22.00	24.74	50.57	4.09	8.96	63.62	3.3
1926/12/31	3.83	21.72	25.33	51.12	4.39	9.46	64.96	4.2
1927/6/30	3.56	21.98	26.46	52.23	4.70	9.98	66.91	6.0
1927/12/31	3.70	22.73	27.37	54.08	5.03	10.50	69.61	8.1
1928/6/30	3.62	22.26	28.53	54.68	5.39	11.05	71.12	4.4
1928/12/31	3.59	23.08	28.68	55.64	5.76	11.60	73.00	5.2
1929/6/30	3.64	22.54	28.61	55.17	6.00	12.09	73.26	0.7

說明：1. 包括金幣、國庫通貨、聯邦儲備券和各種低級通貨；2. 包括前三項總和加可以忽略的美國政府存款；3. 儲蓄和貸款協會的股份資本；4. “調整後的存款總額”、“儲蓄和貸款資本”、“人壽保險保單淨資本”三項之和。

將表4的資料與表2中1921年至1929年間美國GNP年度變化資料相對照（也可見圖4），我們可以看到，貨幣供給的增減狀況與國民生產總值一類經濟指標的升降之間也的確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或一致性：

（1）從1921年6月30日至1929年6月30日，美國的貨幣供給總量每年都在增加，儘管每年增加的幅度有所變化。從1921年6月30日至1929年6月30日止，美國的貨幣供給總量增加了280億美元，增幅為61.8%，平均每年增長7.7%。按照羅斯巴德的說法，“這樣的增幅是非常大的”。<sup>10</sup>而這8年，正是大蕭條發生之前被稱為“喧囂的十年”的美國經濟大繁榮階段的主要時期。



此外，除了個別年份，如1927年（貨幣供給總量上升但GNP卻下降）之外，在絕大多數年份上，貨幣供給總量的變化態勢和GNP的變化態勢之間基本上還是保持一致的。

（2）貨幣供給的增長狀況於1929年上半年達到穩定，“此時銀行存款下降，貨幣供給總量則幾乎保持不變。”<sup>11</sup> 甚至可以說，“從1921年6月以來，貨幣供給總量第一次停止上升，並幾乎保持恒定。”<sup>12</sup> 貨幣供給總量僅僅只是從1928年末的730億美元增加到1929年中期的732.6億美元，年增長幅度僅達0.7%，遠小於之前年均7.7%的增長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正是從這一刻起，20年代的大繁榮即將成爲過去，“大蕭條”即將或者說已經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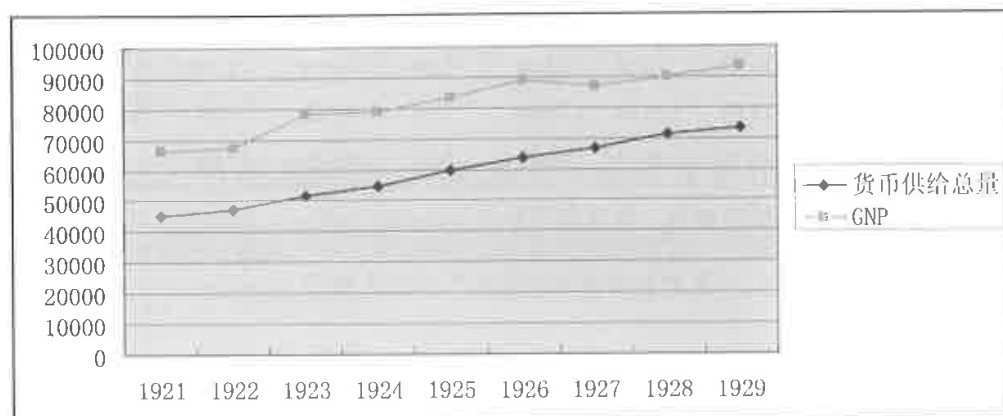


圖4：1921-1929年間美國貨幣供給總量和GNP走勢（羅斯巴德資料）

在《美國貨幣史》一書中，密爾頓·弗裏德曼、安娜-J-施瓦茨想要做的主要事情之一也就是要用美國貨幣史上的一些數據資料來說明貨幣存量的變化與國民收入一類經濟變數的變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貨幣存量的變化對後一類變數變化的影響。表5的資料即采自該書附錄A“基本表格”中的表A-1“1867-1960年經季節性調整的公眾持有的通貨和存款”。





表5：美國1919–1939年貨幣供給總量（單位：10億美元）<sup>13</sup>

年份	公眾持有的通貨	商業銀行			互助儲蓄銀行	郵政儲蓄體系	總和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存款總額			
1919	4.21	19.25	10.04	29.29	4.93	0.16	38.59
1920	4.49	18.66	11.37	30.03	5.36	0.16	40.04
1921	3.74	16.91	11.26	28.17	5.57	0.15	37.62
1922	3.78	19.06	12.86	31.92	5.92	0.13	41.75
1923	3.98	18.96	14.13	33.09	6.40	0.13	43.60
1924	3.92	20.49	15.56	36.05	6.84	0.13	46.93
1925	3.96	22.12	16.94	39.06	7.24	0.13	50.40
1926	3.98	21.46	17.57	39.03	7.70	0.14	50.85
1927	3.86	21.88	19.22	41.10	8.29	0.15	53.40
1928	3.83	22.60	20.14	42.74	8.78	0.15	55.51
1929	3.80	22.63	19.43	42.07	8.82	0.16	54.85
1930	3.81	21.11	19.11	40.25	9.41	0.24	53.71
1931	4.60	17.29	15.45	32.74	9.97	0.60	47.91
1932	4.83	15.51	13.69	29.20	9.90	0.90	44.83
1933	4.84	14.92	11.05	25.97	9.53	1.21	41.55
1934	4.56	18.22	12.29	30.50	9.70	1.21	45.97
1935	4.88	22.15	13.31	35.46	9.84	1.20	51.38
1936	5.47	25.39	14.13	39.51	10.02	1.26	56.26
1937	5.52	23.57	14.88	38.44	10.13	1.27	55.36
1938	5.60	26.13	14.85	40.98	10.24	1.25	58.06
1939	6.21	29.78	15.24	45.04	10.48	1.28	63.01

將表5中的資料與表2中1919年至1935年間美國GNP年度變化資料相對照（也可見圖5），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曾經以羅斯巴德提供的貨幣供給資料為依據時所看到的相同情形，即貨幣供給的增減狀況與國民生產總值一類經濟指標的升降之間的確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或一致性：從1919年到1920年，貨幣存量增長了3.76個百分點，與此相應，GNP則增長了20個百分點。1920年到1921年，貨幣存量下降了6個百分點，GNP則下降了20個百分點。從1921起直到1928年止，貨幣存量持續增長，而除了1926-



1927年外，GNP基本上也是呈持續增長的態勢。從1929年起至1933年，貨幣存量呈逐年下降態勢，與1928年相比，1933年的貨幣存量下降了25個百分點；與此相應，稍微遲滯了一年後，從1930年起至1933年，GNP也同樣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與1929年相比，1933年的GNP總量下降了50個百分點（成為大蕭條的主要表徵之一）。之後，貨幣存量自1934年開始恢復增長，GNP也完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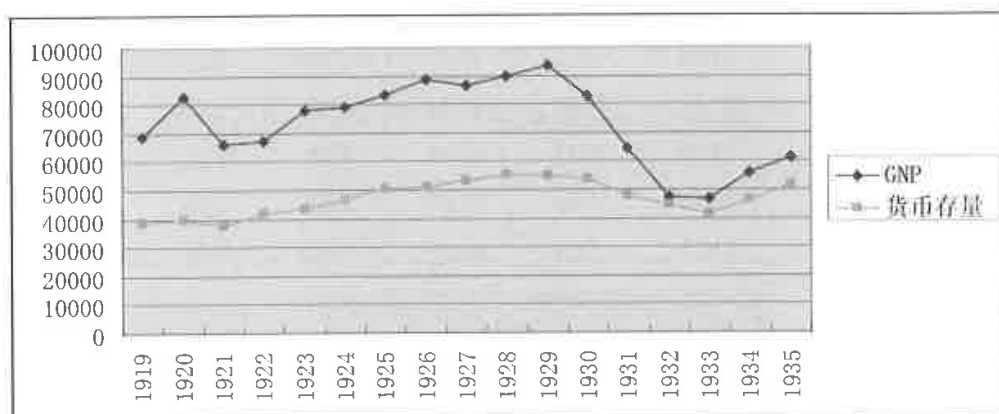


圖5：1919–1935年間美國貨幣供給總量和GNP走勢（弗裏德曼資料）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上述四種學說中的哪一種，都可以從現實生活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事實”依據。因此，單從所謂的“事實”出發，我們是無法對上述幾種理論系統的是非對錯進行最終的、決定性的選擇的。<sup>14</sup> 正如某位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測到，在經濟緊縮階段，貨幣供給、產出水準和價格水準都急劇下降，在經濟復蘇階段則快速上升，但是貨幣供給、產出水準和價格水準這些經濟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較難斷定，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哪些變數是‘因’，哪些變數是‘果’，這也就導致了我們對貨幣因素和產出因素究竟哪個是‘大蕭條’的形成原因的無限制的爭論”。<sup>15</sup>



其次，我們來看看，上述各種因素與週期性經濟危機之間是否確實存在著無可否認的邏輯聯繫？

毫無疑問，光有“事實”資料的支援並不足以“證明”某一種理論觀點的正確性。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所指出的那樣：“雖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觀測到，在經濟緊縮階段，貨幣供給、產出水準和價格水準都急劇下降，在經濟復蘇階段則快速上升，但是貨幣供給、產出水準和價格水準這些經濟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較難斷定，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哪些變數是‘因’，哪些變數是‘果’，這也就導致了我們對貨幣因素和產出因素究竟哪個是‘大蕭條’的形成原因的無限制的爭論”。<sup>16</sup>爲了使某一“事實”對某一理論確實能夠起到支援作用，我們就必須能夠進一步說明這一“事實”與該理論欲用這一“事實”作爲原因來加以解釋的那一現象之間確實存在著無可否認的邏輯聯繫。

如上所述，像西斯蒙第、凱恩斯一類的早期干預主義者多是以“有效需求”這種實際因素的波動來解釋經濟週期的存在，以“需求不足”現象來解釋經濟蕭條的發生。爲了證明這一點，他們都努力地以不同方式來說明“需求不足”與經濟蕭條之間的邏輯聯繫。

在《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書中，西斯蒙第明確地指出，人們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爲了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任何超出人們需要水準的生產都將因其無意義（對自給自足、無須通過市場交換來實行其產品價值的個人或集體來說）或者因其無法與他人產品相交換、因而無法實現其價值（對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通過與他人產品相交換而實現自身價值的生產者來說）而自覺或被迫終止。因此，生產始終應該與人們的需要相適應，生產不應該超出人們對產品的需要。在現代社會組織形式下，由於消費者



只能通過購買的途徑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因此，生產將不是以社會成員的實際需要為限度，而是以社會成員具有的購買力為限度。“即使社會上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合適的房子住，社會也只需要它所能購買的〔產品〕數量。”<sup>17</sup> 如果消費者的購買力能夠持續與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持平，那麼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產品就不乏購買者，生產過程就可以順利進行；相反，如果消費者的購買力相對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而言出現了不足，那麼就必然會有部分產品賣不出去，這部分產品的生產過程就將被迫停止，工廠將被關閉，工人將失業，經濟也就將陷入蕭條的境地。所以，經濟蕭條主要是由於消費者購買力不足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所造成的。

凱恩斯主義者也以“有效需求”這種實際因素的波動來解釋經濟週期的存在，以“需求不足”現象來解釋經濟蕭條的發生。但和“消費不足論”者不同，凱恩斯主義者否定單純用“消費（購買力）不足”這一現象來直接解釋經濟危機的發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有效需求”並不只包括消費需求，除了消費需求之外，有效需求還包括投資需求。因此，只用消費不足來解釋經濟蕭條是不可取的，因為，由消費不足所造成的供求裂隙完全可能由投資需求的變化所填補。假如投資需求真的能夠填補由於消費不足所造成的供求裂隙，那麼生產過程就不會遭遇市場需求不足的困難。只有當投資需求不能填補這一裂隙時，供求平衡才會被打破，經濟才會陷入蕭條境地。美國著名凱恩斯主義者漢森明確寫到：“隨著實際收入的增加，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額日益擴大（直至實現了充分就業的產量時為止）。因此，消費函數的形狀成為擴張的上限。在幾個月或甚至幾年的時間裏，消費與收入之差額會達到其最大水準——如在20世紀20年代的高漲時期，消費與收入均在高水準下持續地保持了兩者之間相當穩定的差額。只要投資，無論是自發投資還是引致投資，足以彌補這一差額，



這種情況就可以持續下去。”<sup>18</sup> 由於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消費需求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邊際消費傾向）會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而逐漸下降，消費不足所造成的供求裂隙會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而越來越大，社會生產對投資需求的依賴程度也會越來越高，因此，經濟蕭條將主要是由於投資需求的波動所造成的。<sup>19</sup> 不過，儘管有這樣一些不同的看法，凱恩斯主義關於經濟蕭條主要源自於“有效需求”不足這一觀點卻是非常明確的，也是和西斯蒙第等“消費不足”論者相一致的。

相反，像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等一類的自由主義話語則多是以貨幣（或信用）數量這種所謂“名義因素”的波動來解釋經濟週期的存在，以“貨幣（或信用）數量”的擴張來解釋經濟繁榮的出現，以“貨幣（或信用）數量”的緊縮來解釋經濟蕭條的發生。換句話說，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經濟週期理論的最大貢獻可能就是突出強調了貨幣或信用因素在經濟繁榮和衰退過程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都努力地以不同方式來說明“貨幣（或信用）數量”的波動與經濟週期之間的邏輯聯繫。

羅斯巴德指出，商業週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經濟繁榮時期商品價格普遍上升（而非某些商品價格上升、某些商品價格不變或下降），在經濟蕭條時期商品價格則普遍下跌（而非某些商品價格下跌、某些商品價格不變或上升）。這意味着，商品價格的上升或下跌不是由於部分商品本身供求關係的變化所導致的，而是某種對所有商品價格具有普遍性影響的因素的變化所導致的。這種對所有商品價格具有普遍影響的因素或許會有很多，但我們首先可以想到的應該就是貨幣。因為在市場經濟中，生產過程是由價格機制來引導的，各種商品的生產規模都是隨其價格的升降運動而發生擴張或收縮，而影響商品價格的主要因素一是商品的供求關係，二是在市場領域中流通著的貨幣數量。如果市





場中發生的是一些商品價格走高，另一些商品價格走低，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由於不同商品的供求關係發生了變化、社會成員的需求從一些商品轉向了另一些商品所致。但是，如果是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同時升高或者降低，那麼就只能是由於市場中流通的貨幣數量發生了變化所致。“只有貨幣的需求，和/或者貨幣的供給，這些因素的變化，才會引起物價（的普遍）變化。”<sup>20</sup>

可是，貨幣數量的變化為什麼會引起經濟週期的出現？對於這個問題，自由主義們當中有著不同的說法。在奧地利學派看來，貨幣數量的波動之所以會引起經濟繁榮和經濟蕭條現象的交替出現，主要是因為經濟繁榮和經濟蕭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規模的擴張和縮減所引發，而投資規模的漲縮在很大程度上又主要是由信貸市場上貸款利率的變化所致。米塞斯認為，“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正是通過影響利率的根本作用來得以體現的。”“貨幣[廣義的]供應的增加或減少，會使信貸市場上的資金的供應增加或減少，從而引起貸款利率下降或上升，儘管初始利率可能沒有變化。”<sup>21</sup>“企業家們是根據價格、工資水準、市場利息率的變化來進行他們的投資安排”的。在市場對貨幣的需求相對不變的情況下，貨幣供應的增加就會導致市場信貸利率的下降。而當貨幣供應增加到一定程度，導致市場信貸利率低於“生產需要的資本貨物所要求的初始利率”的水準時，企業家們就會認為以這樣低的利率水準貸款投資一定是有利可圖的，從而大量進行投資，促使經濟逐漸進入繁榮狀態。相反，當貨幣供應相對市場對貨幣的需求而言出現了不足時，信貸利率就會上升到一個維持較高規模的生產過程所需要的利率水準，企業家們就會認為以這樣高的利率貸款投資一定會無利可圖甚至虧損的，從而紛紛終止投資乃至終止現有的生產，導致經濟進入蕭條狀態。這就是貨幣數量變化與經濟週期之間的邏輯關聯。



弗裏德曼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則有所不同。按照弗裏德曼的看法，貨幣數量的波動對經濟週期的引發作用，不僅可以通過貨幣數量的增減導致信貸利率的升降進而導致投資規模漲縮這一條路徑，而且還可以通過另一條路徑，即通過影響個人貨幣需求的變化進而影響物價的波動再影響投資規模的變化這一途徑。弗裏德曼認為，個人對貨幣的需求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個人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當貨幣供應過度導致貨幣存量超過經濟運行實際需要的數量因而造成貨幣貶值時，在貨幣名義報酬率（利息率等）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人們就會爭相減持貨幣，增持實質性商品，導致實質性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刺激實質性商品生產的擴張；反之，當貨幣供應不足導致貨幣存量低於經濟運行實際需要的數量因而造成貨幣升值時，人們就會爭相增持貨幣，減持實質性商品，從而導致實質性商品價格下跌，導致實質性商品生產的萎縮。

可見，干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對自己所提用來解釋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邏輯關聯進行了說明。那麼，我們到底該怎樣來評價他們所做的這些說明呢？影響經濟週期的主要因素到底是有效需求一類的實際因素還是貨幣一類的名義因素呢？

事實上，圍繞著這個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們曾經展開了長期的爭論，迄今為止仍沒有定論。

例如，米塞斯在《人類行爲》一書中就對以“有效需求”一類實際因素來解釋經濟週期的看法明確進行了批評。他堅信所有“用非貨幣性理論來解釋經濟的週期性波動”的做法都“是徒勞無益的”。<sup>22</sup>他認為“對商業週期的非貨幣性解釋的理論來說，給蕭條反復出現這一事實找個說法是頭等大事。這種理論的支持者們一開始並沒有在他們對一系列經濟事件的分析中找到任



何線索能夠對這個謎一般的經濟混亂作出令人滿意的解答。他們只能拼盡全力東拼西湊地給自己所謂的週期性理論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事實上，“對於經濟週期的所有非貨幣性解釋都得承認貨幣或者信貸媒介在數量上的增加是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很顯然價格普遍上漲的趨勢（這種上漲的趨勢不是由於商品產量下降或是由於可供甩賣的商品供給縮小而導致的）在貨幣供給（廣義而言）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是不會發生的。現在我們也看到那些曾經反對貨幣性解釋的人們也被迫去求助於他們出於別的目的而大肆攻擊過的理論了。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可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新增的貨幣和信貸媒介是如何影響信貸市場和市場利率的。只有那些認為利率純粹只是為了從制度上解決貨幣短缺的人才無須承認經濟週期的流通信貸理論。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從來沒有什麼批評家能夠對這個理論提出什麼站得住腳的反對意見。”<sup>23</sup> 在《美國大蕭條》一書中，羅斯巴德也對用非貨幣性因素來解釋經濟週期的各種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sup>24</sup>

針對經濟週期主要是由貨幣或信貸的漲縮引起這種看法，凱恩斯曾在《通論》一書中提出反對意見說，影響經濟週期的因素主要是投資需求的變化，影響投資需求變化的因素主要是投資者的投資傾向，影響投資者投資傾向的因素主要是投資者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當預期資本邊際效率處於一種極度低迷的水準時，有可能無論如何增加貨幣、降低利率都無法使預期資本邊際效率達到為使經濟復蘇所需要的地步。這在當代社會尤其如此。凱恩斯說：“由於種種原因，今天的資本邊際效率比19世紀時的資本邊際效率低得多，將來亦可能如此。”因此單純靠增加貨幣供應的辦法很難將市場利率降低到為使生產和就業恢復到合理水準所需要的那種程度。“如果欲使就業水準還說得過去，利息率必須比19世紀平均利息率還要降低許多，那麼，這種利息率是否僅僅通過控制貨幣數量就可以達到，是值得懷疑的。”<sup>25</sup> 反



過來，當與其資本邊際效率處於一個極為高亢的水準時，即使貨幣供應量不足可能也難以阻擋生產和就業的擴張。

漢森也曾經從一種稍微修正過的凱恩斯主義立場出發對奧地利學派等將銀行貨幣或信用的收縮看作是導致經濟繁榮時期終結之主要因素這一觀點進行了批評。漢森寫到：

“如果存在擴張的願望，那麼僅僅是貨幣供給的限制並不能構成嚴重的障礙。可以找到各種方法和手段來調節貨幣供給，以滿足持久繁榮不斷向上的要求。”“關於這一點，有一些歷史事例〔可以證明〕。當皮爾銀行法案以其〔對〕銀行券發行的剛性限制而〔被〕通過時，〔人們〕就引入了存款貨幣來代替銀行券。貨幣和銀行機構已經有了調節自身的方法，以滿足動態社會更深的實際需要。”<sup>26</sup>

漢森堅持認為，經濟週期是由生產過程本身具有的擴張動力和自我限制因素所造成的，而不是由貨幣一類因素的波動造成的。漢森舉例說：“戰後1919-1920年的通貨膨脹也許是是對貨幣理論最有力的支持，這一時期的通貨膨脹經常被認為是由於貨幣手段而阻止的。但是，即使如此，貨幣理論的解釋也遠遠不是結論性的。根據擴張過程本身內部固有的自我限制因素來解釋似乎更有道理。”<sup>27</sup> 漢森對此做了進一步的具體解釋。他說：

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經濟“繁榮是由大量的自發投資和引致投資帶來的。投資量超過了在穩定的價格水準下可以形成的儲蓄。”“1920年私人總投資是85億美元，或者說占國民總產值的22.7%。……引起我們看到的1919-1920年通貨膨脹壓力的正是過量的投資支出。但是，這種大量的投資並不能持續很長的時間。其原因是，自發投資和引



致投資就其性質而言都是不確定和短期性的。”“1920年的存貨情況可以很好地說明引致投資的不確定性。淨存貨積累以49億美元，或者說以占國民總產值5.6%的速度進行。只有產量增長率持續提高，這種存貨淨增加的速度才能維持。一旦接近了充分就業，這個過程就不可能繼續下去了。因此，我們看到了淨存貨積累由1920年的49億美元下降到1921年的1億美元。設備（除廠房外的各種機器和資本設備）投資充分說明了自發投資的作用，儘管1920年的部分投資量無疑是引致，1919年和1920年這兩年中生產者的耐用設備總投資都是67億美元。這樣高的設備投資率是戰爭期間技術進步積累的結果。但是，這種情況並不能持續下去，因為在這種新設備安裝速度下，由技術進步所開闢的投資機會很快耗盡了。因此，生產者的設備投資在1921年降到了30億美元。從1920年到1921年，存貨和生產設備投資的共同下降是整個私人總資本形成總下降93億美元中的78億美元。因此，在存貨和生產設備的情況中可以找到結束1929-1920年膨脹性繁榮的關鍵。”“此外，從1920年到1921年，投資的下降還導致消費支出下降了70億美元。由於政府用於商品和勞務的支出仍然大體上保持不變，因此，國民生產總值的全部下降（180億美元）可以認為是由於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的下降。”據此可以認為，“根據擴張過程內部固有的自我限制因素而進行的這種分析比根據貨幣限制而進行的解釋更為根本。”

漢森接著說到：

“同樣，對1929年擴張中止的貨幣解釋也是不確定的、不充分的。在這裏，自發投資和引致投資的下降再一次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私人總投資從1929年的158億





美元下降到了1932年的9億美元。存貨積累下降了41億美元，生產設備下降了46億美元，建築業下降了51億美元，國外淨投資下降了6億美元。投資的下降顯然既有自發投資又有引致投資。但是，作為1929年崩潰特徵的也許特別是自發投資的下降。與大量新產業、新產品和新工藝相關的創新投資的高漲，是1923-1929年繁榮的特徵，這引起了從1923-1929年平均150億美元的國內私人總投資。由持續的自發投資高漲所引起的樂觀主義無疑引起了由過分高漲心理所產生的大量不適當的投資。但是，解釋投資崩潰的自發投資的暫時耗盡是基本的，而且，這又導致了消費支出的大量削減。”可見，“繁榮終止的遠更多地是擴張過程的內在性質，而不是由於貨幣供給的限制。”所以，“應該在實際因素，而不是在貨幣因素中尋找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sup>28</sup>

上述情況也出現在對1929年-1939年美國大蕭條之原因的爭論中。例如，Lionel Robbins早在1934年就首次試圖從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描述和解釋1929-1934年間經濟大蕭條的發生，說明政府干預的不良後果；<sup>29</sup> A.漢森則於1941年首次用實際資料來論證凱恩斯觀點的正確性，說明政府干預在緩解和消除蕭條過程中重要作用；<sup>30</sup> 弗裏德曼於1963年用大量數據資料論證了貨幣主義關於大蕭條的觀點，說明政府不當干預是導致美國經濟持續陷入蕭條的主要原因；<sup>31</sup> 羅斯巴德於1960年代再次運用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解釋大蕭條的發生；特明則於1976年同樣以大量數據資料為依據反駁了貨幣主義者對大蕭條的解釋，試圖重新論證凱恩斯主義解釋的適當性，並由此引發了兩派之間長期的爭論；<sup>32</sup> Robert J. Gordon和James A. Wilcox于1978發表的文章則試圖對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的解釋進行綜合；<sup>33</sup> 20世紀80-90年代包括艾欽格林、



伯南克等人在內的一批美國學者試圖在國際比較研究的基礎上來推進綜合立場的解釋；<sup>34</sup> 羅默於1990年代試圖在吸收貨幣主義部分成果的基礎上堅持凱恩斯主義對大蕭條的解釋；<sup>35</sup> R. Murphy於2009年再次運用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解釋大蕭條的發生，並對羅默的看法進行批評；<sup>36</sup> 等等。直到目前為止，各派之間的爭論仍無任何確定的結果。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上述各種因素是否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必然結果？

應該說，這是一個比前兩個問題更為根本的問題。毫無疑問，即使我們能夠有效地證明有據可查的某種因素與週期性經濟危機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必然聯繫，但是如果我們無法辨明這一因素是否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必然結果，那我們還是無法對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兩者的是非對錯做出適當判斷。

可以預料，在干預主義者們看來，“需求不足”現象完全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無論是“消費不足”論者還是“投資不足”論者對此都從理論上做了詳盡的說明。

斯密、薩伊、李嘉圖和穆勒等早期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供給能夠自動地產生對自己的需求，<sup>37</sup> 因此需求不足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影響生產規模的主要因素只是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和勞動生產率等。只要有足夠多的生產要素，只要勞動生產率能夠不斷地提高，那麼，生產就可以無止境地增長。而且，這種增長只會提升人類的福利，而不會帶來任何不利後果。正如薩伊所說的那樣：“產品的增加除了增加人類的享受和國家的人口以外，不會有其他結果。”<sup>38</sup> 毫無疑問，對薩伊定理進行反駁是所有干預主義者的主要任務。



在“消費不足”論者看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完全不可能自動維持供求之間的平衡，“消費不足”現象完全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結果。西斯蒙第認為，在自由放任主義條件下，由於生產過程是由每個企業家自己來控制的，各個企業主不可能準確地知道整個社會到底有哪些（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以及各種需要的波動情況。他所關注和唯一能做的就是維持和擴大自己的生產，增加自己的利潤收益。擴大生產就意味着要增加自己產品在市場中的份額，而增加市場份額的主要辦法就是降低生產成本，降低成本的主要辦法之一又是降低工人的工資水準。<sup>39</sup>但一個工廠主如果成功了，其他的工廠主就也會起而效仿，其結果，一方面是生產能力及其規模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則是所用勞動成本或者說工人的工資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當中所占比重的不斷縮小，最終造成整個社會的生產總量超過收入（消費）總量，導致生產過剩。可見，“消費不足”現象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家為擴大市場競相壓低勞動者工資水準的結果。

“投資不足”論者雖然否認經濟危機是直接由“消費不足”現象引起的，認為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的直接因素不是“消費不足”而是“投資不足”，但他們也明確認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完全不可能自動維持供求之間的平衡，認為“投資不足”現象本身是自由放任主義政策下必然會出現的結果。凱恩斯在這方面的論述代表了這種思路最初的一種表述。凱恩斯認為，“投資不足”之所以會成爲一種經常出現的現象，主要是因爲在自由放任制度下，投資者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以及對投資的信心）經常會發生大幅度的波動，以至於社會總投資量達不到社會所需求的規模，結果導致投資不足。凱恩斯指出，“資本邊際效率不僅取決於現有的資本品數量的多少和生產它現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決於對資本品將來收益的預期。……不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對將來的預期是完全靠不住的，這是因爲以變動的和不



可靠的證據作為依據，容易發生急劇而猛烈的變化。”<sup>40</sup> “正是這種波動解釋了商業週期”，<sup>41</sup> 凱恩斯說。

奧地利學派學者普遍否定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可能性。羅斯巴德曾經歸納“消費不足論”的基本觀點：“它斷言在繁榮時期發生一些事情——一些論點認為這是產生了太多的投資和太多的生產，另一些論點認為收入中的大部分流向了高收入階層——這就導致了消費需求不足以至他們不能購買生產出的產品。於是，危機和蕭條接踵而來。”<sup>42</sup> 羅斯巴德認為，這種理論存在著許多錯誤：

“首先”，羅斯巴德說，“只要有人存在，一定的消費水準就能持續下去。即便突然間人們消費減少而囤積增加，他們也必須以最小的額度消費。”因此，只要有人存在，一定水準的消費需求就將持續存在。當然，按照繁榮時期的物價水準，此時（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的確是縮小了，但在沒有外部干預、純粹由市場自行調節的條件下，物價會自行下降至與現有購買力相適應的水準。“沒有理由可以說明，在一個自由市場中，各種生產要素價格和消費品價格不能自行適應人們的需求水準。”隨著物價下跌，同等貨幣存量所具有的實際購買力即有實際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會增加，以至最終完全可以將全部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都吸收掉。這樣，生產過程就始終可以持續進行而不會發生停頓或蕭條。但是，有人會說，這樣一來，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就要虧本了嗎？因為他們之前進行生產時採購的各種生產要素（機器、原材料、勞動力等）的價格要遠遠高於現在。對此，羅斯巴德回答說，許多企業家的確會因此而虧本。但問題是：為什麼之前發生的生產成本會那麼高，以至於以當前的價格出售產品不能獲利？羅斯巴德認為，“消費不足論”不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而奧地利學派的學說則可以很好地作到這一點。



“消費不足論”的一個重要分支認為，消費之所以會出現不足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繁榮時期會出現相對收入向利潤和高收入階層轉移的現象，而富裕階層的消費傾向往往被認為要低於貧困階層，結果導致社會整體消費傾向的下降。羅斯巴德對這種觀點也表示了異議。他提出以下幾點反駁意見：(1) 富人的消費傾向是否要比窮人更低，經驗研究對此不僅沒有提供支持，反而還提出了質疑；(2) 經驗資料也表明，在繁榮時期並不存在著相對收入由窮人向富人轉移的現象。此外，即使我們接受這兩條假設，那麼我們也不要忘了：(1) 富人也要消費。而如上所述，只要有一定的消費存在，經濟危機就不一定會發生。(2) 即使相對收入向富人集中，而富人的消費傾向又相對偏低，但由此形成的儲蓄將等於對生產資料的投資。這些投資如同消費一樣，不僅對於生產結構以及較高生活水準的維持同樣是必要的，而且所構成的投資需求也會促進生產的維持。

“消費不足論”者（如西斯蒙第等人）認為降價銷售將會使需求進一步縮小，生產條件進一步惡化。羅斯巴德否認這種看法。他認為：“價格下跌並不會帶來不景氣；相反，由投資和生產能力的增加而引起的物價下跌可以反映出單位生產成本的下降，所以收益性根本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價格下跌只會將較高的生產能力帶來的成果分配到所有人的手中。”所以，“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就是通過資本的增加和生產能力的提高使物價下跌。貨幣工資率也將趨於下降，……但是貨幣工資下跌幅度比之消費品價格的下跌幅度要小，這樣在整個經濟領域中經濟發展將帶來較高的實際工資率和較高的實際收入。”<sup>43</sup>

羅斯巴德還指出，“如果消費不足理論可以有效地解釋任何危機，那麼蕭條應發生在消費品行業中，該行業的剩餘商品將積壓，同時至少相對的繁榮將發生在生產資料商品行業。但是，通常我們看到的是，在蕭條時期是生產資料商品行業，而不是消費





品行業遭受更大的損害。消費不足理論不能解釋這一現象，而米塞斯理論可以精確地解釋它。每次危機的特點都是不當投資和儲蓄不足，而不是消費不足。”<sup>44</sup>

同樣，自由主義者也普遍否定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會出現“投資不足”的可能性。凱恩斯認為，“投資不足”現象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是因為在特定條件下投資者的投資衝動會下降到市場信貸利率無論如何下調都無法加以改變的地步。而在米塞斯等人看來，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儲蓄，當投資者的投資衝動下降了時，市場信貸利率就會持續下調；同時，由於投資規模下降，投資品價格和工資水準應該也會持續下調；市場利率、投資品價格和工資水準的下調都將改變投資者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最終改變投資者的信心，促使投資者恢復投資。認為市場信貸利率會長期維持在大體不變的水準上，或市場信貸利率無論如何下調都無法改變投資者對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在米塞斯或者弗裏德曼等人看來，是沒有根據的。

與干預主義者相反，自由主義者普遍堅持認為週期性的經濟危機現象不是由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所致，而是由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的一些因素所致。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者都認為，貨幣或信用的擴張和緊縮運動主要是由銀行（主要是像美聯儲一類有能力調控貨幣和信用規模的中央銀行）的決策所致，而中央銀行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體現的是政府的意志，代表的是市場體制以外的一種干預因素或干預力量。因此，歸根結底，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不是來自於市場機制本身，而是市場體制以外的力量。米塞斯明確地說，“週期性的經濟波動並不是自由的不受干擾的市場本身的產物。當政府試圖干涉市場以期把利率降低到在自由市場中本來將由市場決定的利率以下的時候，週期性的經濟波動就出現了。”<sup>45</sup> “通貨膨脹和信貸擴張受到大眾的青睞，這正是政府不斷通過信貸擴張來維持表面繁榮的最





終原因，從而也導致商業呈週期性波動。”<sup>46</sup> 弗裏德曼也明確地說：“經濟大蕭條象大多數其他嚴重失業時期一樣，是由於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而不是由於私有制經濟的任何固有的不穩定性。政府建立的一個機構——聯邦儲備系統——受命掌管貨幣政策的職責。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職責如此不當，以致把否則會是一次緩和的經濟收縮轉變為一場大的災難。”<sup>47</sup> “當時只有少數人知道，而我們現在都知道，大蕭條並非是私人企業的失敗所導致的，而是因為政府並未成功地履行它被賦予的責任。這個責任用《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的話來說，便是‘鑄造貨幣，調節其價值，並厘定外幣價值。’”<sup>48</sup> 羅斯巴德也明確認為：“如果我們假設，商業週期起源於——‘內在於’——自由市場，那麼這樣的想法從表面上來說是對的。但是，這樣的假設是錯誤的，它並不是基於事實，而僅僅是因為信仰。”<sup>49</sup>

由上可見，干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們都努力對自己宣稱為經濟週期之誘因的那種因素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理論上的說明。對於這些觀點完全不同的理論說明，迄今為止，包括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內的人們也無法明斷其是非。

不僅如此，對於隸屬於這兩種不同話語之下的論者來說，還有一個問題是他們必須加以解決的，這就是：迄於1929年“大蕭條”時止的各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實際存在的經濟政策到底主要是自由放任主義性質的還是干預主義性質的？如果主要是自由放任主義性質的，那麼干預主義者對危機發生原因的說明就將進一步得到支援，而自由主義者對危機原因的說明就將受到挑戰。相反，如果主要是干預主義性質的，那麼自由主義者對危機發生原因的說明就將進一步得到支持，而干預主義者對危機原因的說明就將受到挑戰。因此，可以推測，干預主義者將努力去證明迄於1929年時止的歷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存在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都應該屬於自由放任主義範疇，而自由主義者們則將努力去證明迄於



1929年時止的歷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存在的經濟政策都已基本上屬於干預主義範疇，或至少具有濃厚的干預主義色彩。

但問題在於，正如我們在分析1929年大蕭條發生之前的美國經濟政策到底是屬於自由主義還是屬於干預主義時就已經發現的那樣，要完成這種“證明”，無論是對於自由主義者們來說還是對於干預主義者們來說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走向干預主義》一文中我們就已經指出過，幾乎所有有關美國經濟或歷史的文獻都認為政府對經濟過程的干預是美國自立國以來就始終存在的一個現象。我們曾經引用過《新美國經濟史》一書作者的話語來作為這種觀點的一個例證，這裏我們可以再引用一段話來做為佐證。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教授萊文在《劍橋歐洲經濟史》一書中論到1865年1939年間美國經濟政策的一般特徵時認為，“如果將放任政策描述為政府限制直接干涉經濟事務的責任，那麼任何根據‘自由放任’政策描述的早期美國經濟政策都是令人震驚的。歷史記載表明美國政府，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聯邦政府都嚴重地干涉了經濟。”“例如1777年新英格蘭各州通過了一系列相似的‘管理條例’來制定農場工人、機械師和商人的工資以及農產品、加工品和諸如飼養馬匹和訓練馬匹等服務的價格。大陸會議建議所有13個州仿效這些模式，第二年有些州照此實施。”“固定價格並非是政府對經濟僅有的干預，或是處理戰時緊急情況是背離經濟的一種例外情況。美國政府對一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控制一直持續到19世紀。”“1860年以前，對價格的法律管制只是州政府干預經濟的很小一部分。工時受到管制，並且一些州禁止雇用童工。公司受有關許可和檢查的法律的限制，並受公司法中特殊條款的制約。自治市的法令也以此為目標，但人們對其知之甚少。”“州政府的干預也不僅限於管制，他們借助於補貼和鼓勵進行同樣或過多的干預。賓夕法尼亞州政府在各種公司投資了1億美元，向150個混合公司指派董事。南方各州政府為南方鐵路提



供半數以上的投資基金。多個州政府，主要是紐約州政府、賓夕法尼亞州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為開發運河提供了將近所需資金的3/4。並且，州政府將各種補貼，例如免除稅收和壟斷特權，授予那些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司。”“就聯邦政府而言，也從事相似的一系列活動。聯邦政府直接投入資金，贈送國有土地和提供公共信貸用來自主公路建設，開發運河和鐵路建設。聯邦政府為漁夫提供資金，為皮毛商頒發許可證和提供擔保。聯邦政府建立海員醫院，該醫院由強制的保險計畫資助。最重要的是，聯邦政府利用關稅保護促進各種製造業和農業與礦業的各分支行業的發展。”<sup>50</sup>

實際上，這種情況並非只是美國特有的現象，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英國、法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當中。

假如情況真是如上面所說的這樣，那麼干預主義者關於經濟週期主要是起源于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體制的說法就真的大成問題了。道理很簡單：假如政府對經濟過程的干預是一種自美國立國始起就存在的現象，那就意味着所謂的“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在美國從來就未存在過，既然如此，那麼，關於“經濟週期起源于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的宣稱又該從何說起呢？

也正如前面已經描述過的那樣，有鑒於此，許多論者都傾向於以“羅斯福新政”為界，將此前此後區分為兩個不同階段，認為儘管政府干預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始終存在，但在“羅斯福新政”之前的政府干預和之後的政府干預之間還是有著重要的甚至根本的不同。一般而言，“羅斯福新政”之後的干預主義政策要比之前的干預主義政策要更為明確、更為自覺、更為系統和更為有力。例如，萊文在確認了政府干預在美國是自立國以來就一直存在的現象後，就又明確地說道：“但是，許多經濟政策的組成要素和整體特徵在1865-1939年確實發生了變化。”“至於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程度，雖然不像通常設想的的那麼顯著，但卻是不斷增加的。至於干預機制，已從州和地方政



府控制轉向聯邦政府控制；從國會和法庭控制轉向管理委員會控制。至於經濟政策的精髓所在，一種較早出現的普遍觀點認為，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不應該在濟貧上承擔巨大的責任，這種觀點日益讓位於以下的觀點：再分配、保險和救濟是政府最根本的職能。這些變化都是緩慢的，間或的，也常常是以實際處理特定緊急情況的方式出現的，而不是以觀念的巨大改變造成一致的、協調的革命方式出現的。”<sup>51</sup>

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上述問題在一種稍微弱化一些的程度依然存在，即：“羅斯福新政”之前的那些被認為不明確、不自覺、不系統、不太有力的政府干預措施到底屬不屬於干預主義的政策範疇呢？對於自由放任主義者們來說，回答將會是：儘管其中有一部分干預措施應該被歸於自由主義者主張的那種為保障自由主義經濟社會體系正常存在和運轉所必須由政府來實施的政府職能，因而可以算做是自由主義者認可的“有限政府干預”範疇之內，但其中有相當部分措施則應該是超出了這種“有限政府干預”的範圍，屬於干預主義者主張的政府干預措施，而且正是這些超出了“有限政府干預”範疇之外的、帶有干預主義性質的干預措施導致了經濟週期的出現。而對於干預主義者們來說，回答則應該是相反的：對於干預主義者們來說，重商主義衰退之後、“羅斯福新政”之前存在的那些政府干預措施，由於它們的不明確性、不自覺性、不系統性和軟弱性，以及由於這些干預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在制定、實施這些政策時很大程度上仍受到自由主義理念的約束和限制，總體而言仍應該被歸入自由主義的範疇；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這些干預措施在效果上大打折扣，使得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基本上處於自由放任的狀態，使得經濟危機週期性地得以發生。對於這兩種不同的回答，我們將如何來判斷它們之間的是非對錯呢？至少在目前，我的看法仍然是：我們沒有一種確切的辦法來明斷它們之間的是非對錯。



綜上所述，無論是干預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對自己有關於週期性經濟危機誘發原因的學說進行了系統的解釋和論證。但通過上面的描述和分析我們發現，對於干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上述觀點的真假對錯，我們其實完全無法做出終極性的判斷：

第一，如前所述，無論是干預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有關週期性經濟危機誘因的學說，都有一定的經驗事實做支持，對於經濟危機中出現的相關現象都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

第二，在圍繞“影響經濟週期的主要因素到底是有效需求一類的實際因素還是貨幣一類的名義因素”這一問題所展開的爭論中，爭論的焦點其實可以進一步縮小為這樣一個問題，即：貨幣或信貸的漲縮是否可能使市場利率降低到為使生產和就業恢復到合理水準所需要的程度，或上升到為阻擋生產和就業的擴張所需要的程度。對於這一問題，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如果能夠，我們就可以解決“實際因素派”和“名義因素派”之間的爭議；如果不能，那我們就永遠無法解決這兩派之間的爭議。簡單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意識到，這個問題完全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我們既不可能找到充足的理由來宣稱，當經濟處於極度低迷狀態時，貨幣或信貸的擴張絕對能夠或不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降低到為使生產和就業恢復到合理水準所需要的程度；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來證明：當經濟處於極度亢奮狀態時，貨幣或信貸的收縮絕對能夠或不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上升到為阻擋生產和就業的擴張所需要的程度。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情況只能是下述多種可能出現的情形之一：當經濟處於極度低迷狀態時，貨幣或信貸的擴張或者（1）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降低到為使生產和就業恢復到合理水準所需要的程度，或者（2）不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降低到為使生產和就業恢復到合理水準所需要的程度；當經濟處於極度亢奮狀態時，貨幣或信貸的收縮也或者（1）能夠或者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上升到為阻擋生產和就業的擴張所





需要的程度，或者(2)不能夠或者能夠達到使市場利率上升到為阻擋生產和就業的擴張所需要的程度。當實際出現的情形為(1)時，米塞斯等自由主義者的說法就是正確的，凱恩斯等干預主義者的說法則是錯誤的；相反，凱恩斯等干預主義者的說法就是正確的，米塞斯等自由主義者的說法就是錯誤的。

第三，至於各種誘因與自由放任體制之間的關係，我們也無法判斷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兩種不同說法到底是孰是孰非。而且，更為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完全無法對以下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無誤的回答，即：迄於1929年“大蕭條”時止的各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實際存在的經濟政策到底主要是自由放任主義性質的還是干預主義性質的？而只要我們無法對這一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那麼，我們就無法對干預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就各自宣稱的經濟週期誘因與自由放任體制之間關係所提出的不同觀點做出明確的是非判斷。

由上可見，無論是“投資不足論”、“消費不足論”、奧地利學派，還是貨幣主義，都可能是對週期性經濟危機的一種正確描述和解釋，只要在特定時期發生的經濟危機確實是由他們各自描述的那一主要因素（“投資不足”、“消費不足”、信用或貨幣不足等）所引起，以及只要我們願意按照他們各自的理解將歷次經濟危機發生之前的經濟政策稱之為“自由主義”，或者“干預主義”。籠統地肯定其中的一種理論立場而排斥另外一種理論立場的做法當是不可取的。

## 二 蕭條應對策略之闡釋的合理性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上述各種理論當中，哪種理論系統對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或方案的闡釋和論證相對而言更為合理或者可取？





從理論上說，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在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方面所發生的爭論可以簡單地表述為以下這樣一個問題，即“應該通過市場經濟體制的自我調節還是應該通過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來緩解或消除已經發生的經濟蕭條？”。而在這一問題上，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之間理論爭論的焦點又主要是集中在“市場自我調節的有效性”這一主題上。簡而言之，自由主義者充分肯定市場自我調節的有效性（因此當經濟危機發生時完全不必有政府等外部力量的介入，單純依靠市場本身的力量就可以有效緩解和消除經濟危機），而干預主義者則根本否定市場自我調節的有效性（因此當經濟危機發生時必須借助政府等外部力量的介入而不能依靠市場本身的力量來緩解和消除經濟危機）。

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認為，市場體制是人類用來進行分工合作、協調交換過程的最佳社會體制。在市場體制下，每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需要，就必須通過自身的勞動或生產過程向社會提供某種能夠為其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及勞務，並通過在市場上按照等價交換原則與他人自由進行交易的方式來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在一個同類行動主體之間存在著充分的競爭、對每一個行動主體來說都不存在任何外部人為強制的條件下，市場用來對各個行動主體的行為進行引導、激勵和協調的主要機制就是價格機制。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都將依據供求狀況由供求各方之間反復的討價議價過程來確定：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需求者之間的相互競爭將使這種商品的價格逐漸上升，或者促使部分購買力相對較低的買家依次退出交易過程以減少這種商品的需求量，或者促使一些新的生產者依次加入交易過程以增加這種商品的供應量，直至供求狀況處於均衡狀態時為止；反之，當某種商品供大於求時，供應者之間的相互競爭則將使這種商品的價格逐漸下降，或者促使部分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的賣家依次退出交易過程以減少這種商品的供應量，或者促使一些



新的購買者加入交易過程以增加這種商品的需求量，直至供求狀況處於均衡狀態時為止。正如弗裏德曼指出的那樣，在市場體制下，價格機制發揮了傳遞供求信息、激勵供求行爲、分配資源和財富等多重功能。<sup>52</sup> 正是通過（也只需要通過）價格機制的這種作用，市場才（且也必然）有效地擔當起了協調社會成員分工合作過程的功能。市場機制（主要是價格機制）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發而有效地調節著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工合作過程。只要市場體系的上述運作機制沒有因外部力量的作用而受到破壞或阻礙，社會成員之間依市場體系組織起來的分工合作過程就能夠正常的進行，反之則不然。當然，市場體系借助於價格機制等手段來對供求過程進行協調的過程，可能或者說必然會伴隨著生產（包括就業）、流通、消費等經濟、社會生活過程的一些波動，但一方面，這些波動是為協調經濟社會過程正常運作所必不可少的一種現象，另一方面，只要沒有來自市場外部的各種力量的干預，這些波動的幅度一般就不會很大，持續的時間一般也不會很長，經濟社會生活並不會因這些波動而遭受較大的困擾或破壞。

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由於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良好的自我調節功能，當經濟危機發生時，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不僅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還是有害的。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只會對市場經濟本身內在的調節機制產生干擾和破壞作用，而不會起其他的積極作用。經濟運作過程中本來正常的波動之所以會以較大的幅度、以危機的形式發生，正是政府等外部力量干預（或不當干預）的結果；而這些危機之所以又會週期性的發生，也正是政府等外部力量對經濟運作過程反復進行干預的結果。政府等外部力量對經濟運作過程進行干預的力度越大，所引發的經濟危機的程度就可能越嚴重；反之，則可能越低。

與自由主義者相反，所有的干預主義者則都認為，市場體制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完美。由於這樣或那樣一些原因的存



在，市場體制的自我調節功能往往會出現部分甚至完全“失靈”狀況，從而無力對已經陷於失衡狀態的經濟社會過程進行調整。因此，單純依靠市場體制本身的自我調節功能來緩解或消除已經發生的經濟危機是絕不可能的。只有借助於政府等市場體制外部力量的作用，已經陷於失衡狀態的經濟社會過程才能夠迅速地恢復到均衡狀態。

市場體制的自我調節功能為什麼會出現“失靈”現象？或者說，引致市場機制失靈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對此，干預主義者們有著一些不太相同的說法。

作為一個“消費不足論”的信奉者，羅斯福曾經以舉例說明的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過如下解釋。羅斯福說：

“以棉製品業為例。事實可能是，[爲了消除經濟危機] 90%的棉製品生產商會同意取消最低工資，停止延長工時，停止雇用童工，同意防止生產過剩。但是，如果另外那10%的棉製品生產商支付最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在工廠中雇用童工，並生產出我們無法承受的多餘產品，那麼……這不公平的10%會生產出廉價的產品，並足以迫使那90%的人去應對這種不公平的環境。”其結果則是使所有的企業都回到一種不正當競爭的狀態，“這類競爭導致了延長工時、低工資和生產過剩現象的出現”。羅斯福指出，“這就是聯邦政府所要介入的地方。聯邦政府應當擁有並終將獲得這樣的權力，在通過測算並爲一個行業制定規劃之後，在這一行業絕大多數企業的協助下去防止不公平的做法，並依據聯邦政府的授權來實施這項規劃。”<sup>53</sup>

可以把羅斯福的上述論述概括爲一句話，稱之爲“自由放任引致協調失效”命題。這個命題實際上表述了干預主義者認爲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系可能“失靈”的一種情境。



作為一個“投資不足”論者，凱恩斯對“市場失靈”問題所做的解釋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 投資需求的恢復依賴投資信心的恢復，而在以自由放任為特點、沒有政府等外部力量介入的單純市場經濟體系下，投資者的信心往往難以得到迅速的恢復，從而使得陷入蕭條狀態的經濟過程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得到復蘇。而從長遠來看，“我們可能都死了”，凱恩斯戲虐地說。

我們可以把凱恩斯的這一說法概括為“投資信心過度喪失引致投資需求萎縮命題”。凱恩斯對這一命題的具體說明如下：

“在蕭條狀態持續的過程中，……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可能<sup>54</sup>會達到某種程度，以致在可實行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可能使經濟馬上復蘇。”

“要想恢復資本邊際效率並不那麼容易，因為這種恢復實際上是由不受控制的、無法管理的市場心理所決定的。”<sup>55</sup>

“在經濟下降的階段，由於固定資產和原料儲備都處於過剩狀態，經營資本減少，所以資本邊際效率會降低到很低的水準，以致在實際可能的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下調，也無法達到保證令新投資者滿意的程度。就當今這種處於購買者、投機者影響下的有組織的投資市場而論，資本邊際效率的市場估計可能有非常大的波動，不會有相應的利息率的波動能夠與之抵消。”<sup>56</sup>

凱恩斯認為，正是由於這樣一種原因，才需要有政府的干預政策出現。因為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下，若不徹底改變投資市場心理，便不能擺脫就業量（和總供給）的急劇的變動，但



這種徹底的心理改變是不可能的。故我的結論是：決定短期投資的權利絕不能放在私人手裏。”<sup>57</sup>

要想使經濟運行接近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惟一的辦法是由社會從總體上控制投資。”<sup>58</sup>“爲了調節消費傾向和投資誘導使之相適應，政府機能必須擴大。”這“不僅是避免現行經濟形態全部毀滅惟一可行的辦法，而且也是個人積極性能得以充分發揮的必要條件。”<sup>59</sup>

2. 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通常被認爲是借助於工資和價格的靈活升降來進行的，而事實上，因爲工資的和價格的變動具有一定的剛性（或黏性），工資和價格的靈活升降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容易實現，這就使得市場的自我調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滯。

凱恩斯指出，工資和價格的靈活升降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容易實現。這首先是因爲工會組織的存在以及工人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上升或不變而不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下降的政策傾向，使得任何貨幣工資水準向下調整的做法都會受到強烈的反對和阻撓。凱恩斯認爲，在勞動者當中存在著一種堅持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而不抵制實質工資的下降的傾向：“現在日常的經驗毋庸置疑地告訴我們：勞動者堅持要求的（在一定限度內）是貨幣工資而不是實質工資。這種情況絕不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是一種通則。儘管勞動者經常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也[卻]不是每次工資物品價格上漲他們都要丟棄工作不幹。有時人們會說，勞動者只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而不抵制實質工資的下降似乎不符合邏輯，……但是，不論這種做法是否符合邏輯，經驗表明勞動者實際上就是這樣行事的。”<sup>60</sup>“除此之外，通常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證各行各業的貨幣工資同時降低，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同，因而所有勞動者爲了自身的利益都會抵制本行業中貨幣工資的降低。事實上，勞





動者對雇主設法壓低貨幣工資的抵制，較之對因物價上升帶來的實際工資逐漸的和自動的降低要強烈的多。”<sup>61</sup> 由於勞動者的這種堅持抵制貨幣工資而非抵制實質工資下降的傾向，使得任何降低工資的企圖往往都難以實施，從而也就導致了工資剛性，使得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機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我們可以把凱恩斯闡釋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工資剛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

20世紀後期，有一些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者”的西方經濟學家（如N.G. Mankiw, D. Romer等）對上述“工資剛性引致市場失靈”的命題進行了修正，將其改造成為“工資黏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工資剛性”和“工資黏性”之間的區別是：“剛性”意味着不變或難以變動，“黏性”則意味着可以變動但變動比較緩慢。“工資黏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說的是：當經濟蕭條來臨之際，儘管勞動者可能會被迫願意接受工資調整，企業家可能會被迫願意進行價格調整，但由於種種原因，工資和價格的調整的下降並不能迅速到位以致達到足以使市場出清的程度；緩慢的工資和價格調整使經濟回到實際產量等於正常產量的狀態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例如，幾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將持續處於非均衡狀態。導致工資和物價不能迅速調整到位的原因主要有：

(1) 菜單成本的存在。所謂“菜單成本”是指廠商調整產品價格所需要花費的成本，包括調整產品價格所需耗費的實際成本，如研究和確定新價格、編排新價目表、將新價目表通知到銷售點、更換新標籤所需耗費的成本等；也包括調整價格所失去的機會成本。菜單成本的存在，阻滯了廠商對價格的調整行為，使得只有當調整價格所增加的利潤量大於所耗費的菜單成本時，廠商才會願意調整價格（否則廠家可能寧願調整產量），結果導致價格調整的緩慢。





(2) 交錯調整價格和交錯調整工資。廠商很可能不是同步地進行價格的調整，而是分別在不同的時期內先後進行價格的調整，其結果自然是延宕了價格調整的速率，形成了價格的黏性，阻滯了市場調節的正常進行。同樣，廠商也可能不是同步地進行工資的調整，而是分別於不同時期進行工資的調整，結果也導致了工資調整的黏性，延宕了工資調整的速率，防礙了市場調節的順利進行。

(3) 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在存在壟斷勢力的情況下，市場將陷入不完全競爭狀態。處於壟斷地位的廠商（或工會）將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來控制價格（包括商品價格、作為勞動力價格的工資，以及作為信貸價格的利率）的變動，從而破壞了市場調節機制，使得作為價格（商品價格、作為勞動力價格的工資，以及作為信貸價格的利率）不會隨市場對商品、勞動力或信貸需求的變化而變化。

等等。

3. 工資和價格的靈活升降即使可行也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可取。可以把凱恩斯的這方面的論述概括為“工資下降引致總需求萎縮”命題。之所以工資和價格的靈活升降即使可行也並非一定可取，其理由主要是因為假如貨幣工資真的下降了，由於工資的下降可能會導致總需求的下降，因此很可能不僅不會幫助實現市場的自我調節，反過來還會破壞市場供需之間的平衡，引致蕭條發生。

凱恩斯指出：“古典學派一直認為經濟體制有自動調節的特性（因為他們假設貨幣工資具有伸縮性）。在貨幣工資呈剛性的時候，這種剛性往往是經濟體制失調的癥結所在。”古典學派持這種看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貨幣工資可以使產品成本相應降低，故可以刺激需求，進而增加產量和就業。倘若生產設備不變，產量增加會導致勞動



力邊際效率降低。當其影響剛好與勞動者同意接受的貨幣工資降低的影響互相抵消時，產量與就業的增長即告終止。”<sup>62</sup> 凱恩斯批評說：“這種解釋說到底，等於承認貨幣工資降低時需求不受影響。”而事實上，由於以下原因的存在，貨幣工資的降低可能會使總需求隨之下降：

(1) 貨幣工資降低會引起物價下降，使得實際收入從貨幣工資勞動者那裏轉移到地主和企業家階層，乃至轉移食利者階層，這種轉移可能會導致社會消費傾向的降低，從而減少消費需求。

(2) 貨幣工資的降低可能導致工資還會進一步降低的預期，從而導致投資的延期。

(3) 貨幣工資及物價的普遍降低可能導致公眾預期今後工資和物價會上漲，對社會前景失去信心，從而引起流動性偏好增強，導致利息率上升，阻礙投資需求增長。

(4) 工資和物價的大幅度降低，會使負債較多的企業瀕臨破產的境地，也會使國債及賦稅的實際負擔加重，從而影響投資需求。

毫無疑問，總需求的下降必然會破壞經濟平衡，引發經濟蕭條。所以，工資和價格的下降即使可行，也不可取。

以上三個命題實際上表述的是凱恩斯認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系可能“失靈”的另外三種情境。

作為一個修正的凱恩斯主義者，在《財政政策與商業週期》一書中，漢森對為什麼說只有借助於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才能夠消除已發生的經濟危機這一問題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按照這種解釋，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市場經濟體系具有能夠自我調節的能力，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經濟運行過程中許多結構性變遷的出現，市場經濟體系的自我調節機制受到了破壞，其自我調節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從而使得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成為必要。漢森說：“在十九世紀，來自政府或私人部門組織化



干涉和控制的程度相對較低，一種自動化的價格機制能夠有效運作。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別單位都只構成一個小小的原子，不但無法控制內在於價格機制的一般趨勢，反過來還被這些趨勢所控制。然而，與此同時，特別是自1870年代以來，與價格機制的自動調節功能相抵牾的各種制度性干預也逐漸地發展起來，儘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干預手段只起了相對微小的作用。”“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沒有任何單個的實體可以強大到足以對價格機制施加有效的控制。而在一個規制化的經濟中，政府、企業以及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市場機制之上。許多人堅持認為正是價格體系的這種不完備性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在取得充分就業方面的失敗。另一些人將導致這種失敗的原因歸咎於企業的價格政策，還有人將其歸咎於工會的實踐，以及政府所施加的限制。”“制度性安排方面發生的這些巨大變革無疑是有意義的。回到原子化的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來自企業、工會以及政府的干預將持續存在。現代民主並不意味着個人主義。……我們並不能夠在‘計畫還是無計畫’之間進行選擇，而只能夠在是實行民主化的計畫還是實行專制化的規制之間進行選擇。”<sup>63</sup>

與上面類似，我們也可以把漢森表述的這一種解釋概括為一個命題，稱為“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引致市場調節失效”命題。

以上5個命題，合起來構成了干預主義者在論證為什麼只有借助於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才能夠緩解或消除經濟危機的主要理論依據。干預主義者們認為，正是由於上述“市場失靈”現象的存在，才使得政府干預成為必要。沒有政府等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預，已經發生的危機就可能會由於得不到及時緩解而演變為長期性的蕭條，正像美國1929年-1933年時所發生的情況那樣。

毫無疑問，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是非對錯與上述“市場失靈”諸命題的成立與否緊密相關。假如上述幾個有關“市場



失靈”的命題真的能夠成立的話，干預主義關於只有借助於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才能緩解或消除經濟危機的看法應該就是正確的，自由主義關於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看法就是錯誤的；反之則不然。

那麼，干預主義者提出的上述幾個命題到底能否成立呢？我們可以簡單地來考察一下。

1. “自由放任引致協調失效”命題：初看之下，此一命題似乎顯得非常有道理，但仔細思考一下，就可以發現，此一命題實際上只有在以下前提下才是有道理的，這個前提就是：我們有必要來統一確定工時長度、工資水準以及勞動者就業年齡等事項。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根本沒有什麼必要來統一確定工時長度、工資水準以及勞動者就業年齡等事項，那麼“自由放任會引致協調失效，只有借助於政府的力量才能夠實現這種協調”一類的說法就毫無意義。誠然，包括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會否認，在需要通過對市場體系內相關社會成員進行協調來確定統一的行為規範（如工時長度、工資水準、用工性別和年齡、退休時間、勞動保護、私有財產處置和保護、遺產繼承等等）時，自由放任肯定是不可取的一種社會狀態，政府的介入很可能是一種相對而言最有效的方式。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並不是要不要有政府的干預，而是政府干預的範圍應該如何來加以界定。弗裏德曼明確指出過，“在思想上不自我矛盾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sup>64</sup>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的干預應該被限制在一個盡可能小的範圍內，而干預主義者則認為政府的干預可以被擴展到一個相對較大的範圍內。此即所謂“小政府”與“大政府”之爭。但難點在於，如何來確定“小政府”與“大政府”的界限呢？像“人身自由”、“財產保護”一類的事項，大家可能都會同意最好通過政府的介入來制定規則、裁決糾紛。但對於工時長度、工資水準、勞動保護、退休時間、用工性別和年齡等事項



是否也應該通過政府的介入來確定一個統一的規則呢？在這些議題上，大家的意見便可能很不一致。干預主義者認為應該，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不應該。到底應該還是不應該，我們可能難以甚至無法形成一個最終的共識。因此，承認“自由放任會引致協調失效，只有借助於政府的力量才能夠實現這種協調”這一點，並不能夠幫助我們解決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之間就我們是否應該在“工時長度”、“工資水準”、“勞動保護”、“退休時間”、“用工性別和年齡”等具體事項方面通過政府介入來來確定一個統一的規則問題所發生的分歧。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預言，像孔德所宣導的那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人們在這些問題上所發生的分歧，基本是無望的。

2. “投資信心過度喪失引致投資需求萎縮”命題：在上述那些屬於凱恩斯“干預主義合理性證明”最重要的段落中，我們看到，凱恩斯提出來作為干預主義之依據的大都是一些“可能性”：如“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可能會達到某種程度”，“要想恢復資本邊際效率並不那麼容易”，“資本邊際效率的市場估計可能有非常大的波動，不會有相應的利息率的波動能夠與之抵消”，等等（只是在最後一句話中才提出了一個比較確定的判斷來作為依據：“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下，若不徹底改變投資市場心理，便不能擺脫就業量[和總供給]的急劇的變動，但這種徹底的心理改變是不可能的”）。這不能不使人對凱恩斯干預主義合理性證明過程的內在邏輯產生懷疑：從這樣一些“可能性”出發，如何能夠得出一種具有必然性的結論呢？按理，任何“可能性”都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種“必然性”。而且，當我們說某一現象的出現具有“可能性”時，同時也就包含了該現象不出現的“可能性”。譬如，當我們說“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可能會達到某種程度，以致在可實行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可能使經濟馬上復蘇”時，只是宣稱了資本邊





際效率的崩潰“可能”會但非“必然”會達到“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可能使經濟馬上復蘇”的程度，並且，同時也隱含著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不一定達到上述程度這樣一種可能性。從這樣一些“可能性”出發，我們應該只能夠得出一些同樣只具有可能性的結論，譬如，由於“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可能會達到某種程度，以致在可實行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可能使經濟馬上復蘇”，由於“資本邊際效率的市場估計可能有非常大的波動，不會有相應的利息率的波動能夠與之抵消，”等等，因此，我們有可能（但並非必然）需要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從總體上控制投資。正如我們從一個人“吹了風受了涼有可能會生病”這一判斷出發，只能夠得出他或許將可能需要住院治療（一旦他生病的可能性變成現實），而不能得出他必須住院治療這種結論一樣。像凱恩斯這樣，從上述一些可能性出發直接得出“政府必須對投資進行控制”、“政府機能必須擴大”這樣一種結論，其間的邏輯是可以被質疑的。

3. “工資和價格剛性（或黏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這裏實際上涉及到兩個非常類似但還是有所不同的命題，即“工資和價格剛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和“工資和價格黏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我們先來看前一個命題。凱恩斯用來證明這一命題的主要論據是認為“勞動者具有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上升或不變而不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下降的政策傾向”，而這一所謂的政策傾向並無實際依據，純屬推測。此外，即使我們承認勞動者具有這種傾向，但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經驗觀察都可以讓我們意識到以下這一點的可信性：在經濟蕭條來臨之際，維持貨幣工資水準不變必然意味着失業人口的增加，當面臨著是維持工資不變，還是準備失業的兩難選擇時，勞動者會做何種抉擇應該不難判斷。所以，用“勞動者具有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上升或不變而不樂意接受貨幣工資下降的政策傾向”來證明工資和價格剛性是難以成立的。





再來看“工資和價格黏性引致市場失靈”命題。新凱恩斯主義者用來證明這一命題的主要論據是(1)菜單成本的存在；(2)交錯調整價格和交錯調整工資；(3)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幾個論據，儘管其本身所描述的現象可能存在，但其作為干預主義理論之依據的意義卻還是值得懷疑。

第一，毫無疑問，價格的調整確實會需要耗費一定的“菜單成本”。然而，和龐大的商品交易數量及其收益（或損失）比較起來，價格調整所耗費的成本恐怕是微不足道的。試圖以這樣一些微不足道的菜單成本的存在來論證工資和價格的變動會具有“黏性”恐怕是不太容易讓人信服的。自由主義者也確實對此加以了嘲笑。<sup>65</sup>

第二，交錯調整價格和交錯調整工資現象的存在確實可能會導致價格和工資調整的黏性，但即使是新凱恩斯主義學者自己的分析也表明，假如市場是處於完全競爭狀態之下，那麼交錯調整價格和交錯調整工資現象就會大大減少，同步調整工資和價格的現象就會大大增加。換句話說，交錯調整價格和交錯調整工資現象本身就可能是市場競爭不完全的結果。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把提高市場競爭的充分程度而是把加強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呢？

第三，假如市場處於不完全競爭狀態，壟斷力量的存在確實具有破壞市場調節機制的的作用，但和上面一樣，從這一點出發為什麼一定只能得出要加強政府調節功能的結論呢？為什麼不能得出應該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來削弱壟斷力量從而維護市場調節機制的結論呢？

4. “工資下降引致消費需求萎縮”命題：不難發現，凱恩斯對這一命題的論證幾乎也都是建立一些未經證實的推斷或“可能性”之上的。如：



(1) 認為貨幣工資降低引起的物價下降會使得實際收入從貨幣工資勞動者那裏轉移到地主和企業家等高收入階層，這種看法有點匪夷所思，與物價下降會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以及降低企業家利潤這些常識性看法相距過遠。

(2) 貨幣工資的降低可能導致工資將進一步降低的預期（從而導致投資的延期），但正如凱恩斯自己也承認的那樣，貨幣工資的降低也完全可能提高投資的預期效率，從而增加投資。這兩種可能性中的哪一種會成為現實，並無絕對的規律可尋。因此，我們並不能夠只依據前一種可能性來制定對策。

(3) 貨幣工資及物價的普遍降低可能會導致公眾預期今後工資和物價繼續上漲，從而引起流動性偏好增強，導致利息率上升，阻礙投資需求增長；但同樣如凱恩斯自己意識到的那樣，貨幣工資及物價的下降也可能會由於減少交易所需的現金數量而降低流動性偏好，從而降低利息率，提高預期投資效率，擴大投資需求。

(4) 工資和物價的大幅度降低，確實可能會使負債較多的企業瀕臨破產的境地，也會使國債及賦稅的實際負擔加重，從而影響投資需求；但在自由主義者們看來，負債較多的企業或許本來就是經營不善或做了不當投資的企業，讓這些企業破產本就是經濟衰退的題中應有之義，通過通貨膨脹的辦法把它們保留下來本就是一項錯誤的政策。

5. “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引致市場調節失效”命題：稍做思考我們就會發現，漢森對這一命題所做的論證很大程度上是在同義反復。漢森用來證明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是：“政府、企業以及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市場機制之上”這樣一種結構-制度性的變化既是“有意義的”，也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無法改變的歷史之必然。或如漢森自己所說：“我們並不能夠在‘計畫還是無計畫’之間進行選擇，而只能夠在是實行民主化



的計畫還是實行專制化的規制之間進行選擇。”<sup>66</sup> 實際上漢森提出來作為論據的這兩點——(1) 這樣一種去市場化的結構—制度性變化是“有意義的”；(2) 這樣一種去市場化的結構—制度性變化是“不可抗拒的”——本身乃是一個需要加以論證的觀點。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這樣一種去市場化的結構—制度性變化既是無意義的，也是完全可以抗拒的——因為它本身並非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只是一種人為的、由人們在一種錯誤的理論話語引導下所完成的建構，因而也完全可以由人們在一種恰當的話語（譬如自由主義理論話語）的引導下加以糾正和改變。可見，“政府、企業以及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市場機制之上”這樣一種結構—制度性的變化是“有意義的”還是“無意義的”，是“不可抗拒的”還是“可以抗拒的”，本身仍是一個需要進一步加以討論和論證的問題。如果這樣一種去市場化的結構-制度性變化本身像漢森所斷定的那樣確實是不可抗拒的，那漢森的結論——在這種結構—制度性變化的新條件下市場調節已經無可能再有效——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這樣一種去市場化的結構-制度性變化本身是可以抗拒的，那漢森的結論應當被拒絕。所以，漢森實際上是將該問題的討論中一個自身仍需要進一步證明的觀點拿來作為了證據，這在邏輯上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可見，干預主義者提出的上述幾個有關“市場失靈”的命題並非總是成立，但也並非總是不成立。它們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成立還是不成立，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經驗問題。當：

(1) 當所有的人（或多數人）都認為在工時長度、工資水準、用工年齡等方面應該有一個全社會都遵守的統一的行為規範時；或

(2) 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確實達到了某種程度，以致在可實行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能使經濟馬上復蘇；或



(3) 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狀態確實無法削弱或改變，因而充分競爭機制確實無法有效形成；或

(4) 工資下降引致的需求萎縮幅度大於產品價格下跌引致的需求擴大幅度；或

(5) “政府、企業以及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市場機制之上” 這樣一種結構-制度性的變化確實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無法改變的歷史之必然；

等等時，它們就是成立的。反之，當：

(1) 當所有的人（或多數人）都反對在工時長度、工資水準、用工年齡等方面應該有一個全社會都遵守的統一的行為規範時；或

(2) 資本邊際效率的崩潰並沒有達到這種程度，以致在可實行範圍內無論利息率如何降低都不能使經濟馬上復蘇；或

(3) 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狀態能夠被削弱或改變，因而充分競爭機制可以有效形成；或

(4) 工資下降引致的需求萎縮幅度小於產品價格下跌引致的需求擴大幅度；或

(5) “政府、企業以及有組織的團體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施加於市場機制之上” 這樣一種結構-制度性的變化並非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無法改變的歷史之必然；

等等時，它們就是不成立的。

因此，用上述幾個命題來否定市場調節的有效性並非毫無道理，但也並非總是靈湯妙藥。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都有自己的道理。籠統地肯定其中一個而否定另外一個可能都是不適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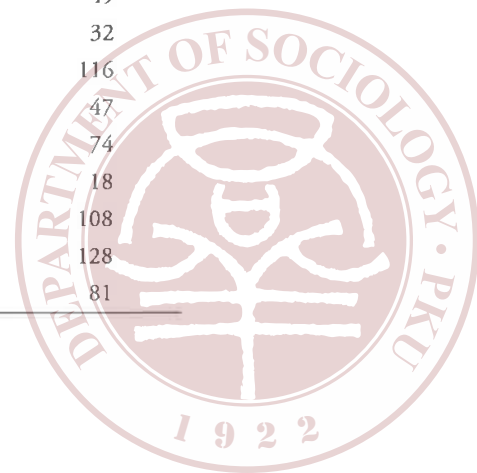
可見，對於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種理論系統就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所做的理論闡釋誰更為可取這一問題，我們也無法做出絕對的、終極的判斷。



那麼，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到底怎麼樣呢？政府等外部力量對經濟過程的干預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我們是否可以通過經驗事實所提供的有關資訊來對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是非對錯做一判斷。我們仍以美國的情況為例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以下是美國自1854年至2009年間歷次經濟危機的有關資料。

表6：美國經濟週期的擴張與收縮（1854–2009）<sup>67</sup>

經濟週期		持續時間			
波峰	穀底	收縮期	擴張期	週期長度	
		P-T	T-P	T-T	P-P
	1854.12	—	—	—	—
1857.6	1858.12	18	30	48	—
1860.10	1861.6	8	22	30	40
1865.4	1867.12	32	46	78	54
1869.6	1870.12	18	18	36	50
1873.10	1879.3	65	34	99	52
1882.3	1885.5	38	36	74	101
1887.3	1888.4	13	22	35	60
1890.7	1891.5	10	27	37	40
1893.1	1894.6	17	20	37	30
1895.12	1897.6	18	18	36	35
1899.6	1900.12	18	24	42	42
1902.9	1894.8	23	21	44	39
1907.5	1908.6	13	33	46	56
1910.1	1912.1	24	19	43	32
1913.1	1914.12	23	12	35	36
1918.8	1919.3	7	44	51	67
1920.1	1921.7	18	10	28	17
1923.5	1924.7	14	22	36	40
1926.10	1927.11	13	27	40	41
1929.8	1933.3	43	21	64	34
1937.5	1938.6	13	50	63	93
1945.2	1945.10	8	80	88	93
1948.12	1949.10	11	37	48	45
1953.6	1954.5	10	45	55	56
1957.8	1958.4	8	39	47	49
1960.6	1961.2	10	24	34	32
1969.12	1970.11	11	106	117	116
1973.11	1975.3	16	36	52	47
1980.1	1980.7	6	58	64	74
1981.7	1982.11	16	12	28	18
1990.7	1991.3	8	92	100	108
2001.3	2001.11	8	120	128	128
2007.12	2009.6	18	73	91	81





從上表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經濟週期和經濟運行狀況有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

1. 相對於1945之前，1945年之後美國歷次經濟週期的平均長度有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趨勢是週期的平均長度越來越長。從1854年至1945年，美國共出現22輪經濟週期，週期平均長度（從谷底到穀底，T-T）為49.5個月；從1945年至2009年，美國共出現11輪經濟週期，週期平均長度為69.4個月。換句話說，相對於1945年之前，1945年之後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頻率降低了。在1854年至1945年的91年裏，美國共發生經濟危機22次，平均每4年左右發生一次；在1945年至2009年的64年裏，美國共發生經濟危機11次，平均每6年左右發生一次。

2. 相對於1945年之前，1945年之後美國歷次經濟週期的收縮期（從前一個峰頂到穀底，P-T）有比較明顯的縮短，擴張期（從穀底到峰頂，T-P）則有明顯延長。從1854年至1945年，美國歷次經濟週期中的收縮期平均長度為20.6個月，擴張期平均長度為28.9個月；1945年之後美國歷次經濟週期中的收縮期平均長度約為11.1個月，擴張期平均長度為58.4個月。由此可見，1945年之後美國經濟週期平均長度的延長主要是由於收縮期的平均長度大大縮短、擴張期的平均長度大大延長所致。<sup>68</sup>

3. 相對於1945年之前，1945年之後美國歷次經濟週期中收縮期平均長度與擴張期平均程度之間的比例也有了根本性的變化。1854年至1945年間美國歷次經濟週期中收縮期平均長度和擴張期平均長度之比約為2:3，雖然擴張期相對較長一點，但長得不多，總體上看歷次經濟週期中收縮期和擴張期的時間長度乃大體相當。然而，由於收縮期平均長度大大縮短，擴張期平均長度大大延長，1945年至2009年間美國歷次經濟週期中收縮期平均長度和擴張期平均長度之比則變為1:6左右，整個經濟週期基本上是由



擴張期所占，從而使1945年之後美國的經濟運行看上去大部分時間都處在經濟擴張過程之中。

1945年可以視為美國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一個分水嶺。雖然像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們都承認的那樣，在美國，明確、自覺、系統和有利的干預主義發展政策始自1934年啟動的“羅斯福新政”，但在1945年之前，一方面由於干預主義政策本身尚不成熟，另一方面也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和影響，使得干預主義政策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實際效果難以得到準確評估。1945年之後，儘管美國的經濟社會政策隨著總統的更替也時有調整，但總體上講都可歸入凱恩斯式干預主義的範疇之內，而且干預主義政策本身也日臻成熟。因此，我們似乎完全可以用上述數據資料來為干預主義政策辯護。以上述資料為據，我們似乎完全可以說，在緩解經濟週期方面，干預主義政策是完全有效的；1945年之後美國經濟週期基本特徵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干預主義政策的結果（儘管也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如產業結構的變化等在起作用）。

然而，對於上述解讀，自由主義者也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反駁。自由主義者會認為，對表9-1資料的上述解讀完全是停留在一種表面的層次上。從表面上看，1945年以後的美國經濟週期確實有很大的變化。週期的平均長度確實是延長了，因此，單位時間內週期發生的頻率確實是降低了；週期中的收縮期確實縮短了，擴張期確實延長了，因而經濟運行確實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擴張過程之中了。然而，這並非意味着引發經濟週期的那些問題真正地被解決了。這些問題其實並沒有被解決，而只是被干預措施造成的虛假繁榮暫時掩蓋起來了，或者，至多可以說，被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暫時解決了。例如，按照奧地利學派的說法，經濟週期是由於信貸擴張所引發的各種不當投資的擴張和收縮造成的。



信貸擴張歪曲了市場利率，使投資者對在均衡市場利率條件下本來無利可圖的一些投資領域產生了錯覺，從而對這些領域大量進行投資，促成了經濟的虛假繁榮。一旦信貸收縮（這是由信貸系統的內在機制所致，因為信貸不可能永無止境的擴張），這些投資的不當性（例如，缺乏真正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些投資項目及其配套項目的建設和持久運行）就暴露無遺，從而成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些“雞肋”被棄之一旁。在經濟緊縮階段，這些不當投資本應該儘快被清除出去，使本來就有限的實際資源被配置到真正為社會所需要、因而真正可以盈利的領域當中去。在沒有政府等外部力量干預的情況下，自由放任的市場將通過自身內在的調節機制來做到這一點，從而使經濟儘快恢復到健康狀態。而政府通過財政或信貸擴張政策進行的干預則將中止這樣一種市場清算的過程，使這些不當投資得以保留甚至繼續維持和延續下去，從而使整個經濟結構變得更加扭曲。表面上看，“新一輪的信貸擴張席捲了上一次繁榮殘留下來的不良投資和不良雇傭，似乎是在對先前的失誤做一些彌補。而事實上這些不良成分都還未被上一次繁榮之後緊接著的經濟調整改造好。其實新一輪的信貸擴張僅僅只是打斷了經濟重新調整的過程，並且延緩了經濟回歸健康狀態的過程。”<sup>69</sup> 通過中止本來應該讓其繼續下去的市場清算過程，政府的干預確實是可以起到縮短經濟週期中的收縮期、延長擴張期這樣一種作用，使得經濟週期表面上出現表9-1中的資料所呈現的那樣一些特點，但這種作用或效果是以不當投資的一次次累積、以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以合理利用這些資源的機會一次次喪失為代價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二十世紀後半期日益突顯的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視為干預主義戰略的後果）。因此，表9-1的資料向我們呈現的只是政府干預所帶來的表面效果，而在這些表面效果之下、或者說被這些表面效果所掩蓋的那些負面後果卻是這些資料無法反映的。事實上，



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經濟的運行將會變得既更加富有效率，又更加平穩有序。

可見，正如我們前面所遭遇過的情形一樣，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所做的闡釋孰是孰非這一問題上，單純的“經驗事實”也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確切無疑的東西。

此外，在自由主義者們看來，干預主義政策之所以是一種不當的政策，除了在於這種政策會通過延緩市場出清進程來延緩經濟危機的緩解之外，而且還在於這種政策必然會導致其他一些不良後果，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通貨膨脹。無論是政府的赤字財政政策、福利國家政策，還是工會對工資的剛性要求，最終都會導致通貨膨脹現象的出現。<sup>70</sup> 哈耶克明確指出：

“福利國家所具有的各個主要特徵都趨於刺激通貨膨脹；而且我們也已知道，來自工會的提高工資的壓力與當下的充分就業政策結合在一起，也會促成通貨膨脹；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財政負擔也會導致其不斷試圖以降低幣值的方式去減輕這一負擔。在這裏，我們還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個問題未必與上述情形有必然關係，但是只要政府財政取之於國民收入的份額超過了25%時，它就必定會訴諸通貨膨脹來減輕其應負的責任負擔。此外，一如我們所見，由於在累進稅制下，通貨膨脹有助於政府增加稅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將在比例上超過收入的增加，所以訴諸通貨膨脹的誘惑力也就變得愈來愈大了。”<sup>71</sup>

通貨膨脹會帶來種種不良後果，如會通過扭曲價格機制而擾亂市場秩序，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會通過減少債務人的實際



負債來實現財產在債權人—債務人之間的一種不合理的重新分配（甚至可能導致部分債權人的破產）；在累進稅制下，會通過提升人們的名義收入而自動增加稅負，從而對經濟增長形成負刺激（但卻會自動增加政府的稅收，這也正是政府為何會對通貨膨脹政策樂此不疲的重要原因之一）；會通過迫使企業頻繁地改變價格而增加企業的“菜單成本”（重新定價、制定新價目表、更改價格標籤等）；最後，會通過貨幣在長時段內的持續貶值而使所有人的財富貶值，一方面使人們普遍日趨貧窮（相對人們本來應該積累起來的實際財富數量而言），<sup>72</sup> 另一方面又使人們對政府的福利形成了更加難以擺脫的依賴。對於最後這一點，哈耶克充滿憂慮的說到：

“如果說福利國家的各種制度都趨於刺激通貨膨脹的話，那麼更為真切的是，通貨膨脹的種種結果，反過來又強化了人民對福利措施的需求。”<sup>73</sup> “我們能夠從那個在這四十多年通貨膨脹背景下工作而現在需要用其工作所獲來養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貨膨脹這股潮流對他們的影響。”

借助于一項統計調查所得出的結果，我們便可以看到通貨膨脹對當前即將退休者的儲蓄所產生的影響。該項調查的目的是要確定若干國家中的個人從1913年到1958年這四十五年中累計儲蓄的現值：這些個人在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實際價值相等的一筆錢儲蓄起來並按4%的固定利率進行投資。假如貨幣價值一直未變，並將這些儲戶到了第45個年頭時所擁有的貨幣總量確定為100，那麼，到了1958年，這些儲戶的貨幣究竟保留了多少實際價值呢？以下是該項研究最終的計算結果：<sup>74</sup>





國別	百分比
瑞士	70.0
加拿大	59.7
美國	58.3
南非	52.3
英國	50.2
瑞典	50.1
新西蘭	49.9
挪威	49.4
埃及	48.2
丹麥	48.1
荷蘭	44.0
愛爾蘭	42.1
德國	37.1
比利時	28.8
秘魯	20.6
義大利	11.4
法國	11.4
希臘	8.4

哈耶克分析說，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到：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即瑞士，貨幣的實際價值可以達致70%；美國和加拿大的儲戶還算過得去，其實際價值約為58%。英聯邦中的大多數國家以及‘英鎊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國的貨幣實際價值大概可以保持在50%上下，而德國儘管損失了1924年以前的儲蓄，其實際價值仍可維持在37%；然而，與法國和義大利的投資者相比，上述所有國家的投資者都還屬幸運者之列，因為在法國和義大利，到1958年初，投資者于此前時間中的整個儲蓄，其實際價值僅為11-12%。”<sup>75</sup>



假如自由主義者的這項指控是真實的，那麼在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者的相關爭論中，自由主義應該可以得到有利於自己的一分。然而，在這裏，就像我們前面已經屢次碰到過的情況一樣，問題同樣並非如此簡單。對於自由主義者的這項指控，干預主義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凱恩斯等人認為：

第一，由政府干預等市場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貨幣擴張並不一定會導致通貨膨脹。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者都傾向於認為，在貨幣流通速度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商品價格的變動主要取決於商品供求關係的變化：當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就將上升；反之價格就將下降。而貨幣數量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需求的變化——貨幣數量的增減會直接導致市場需求的增減。<sup>76</sup> 因此，如果貨幣數量即市場需求的增加速度大於需要用貨幣來購買的商品供應數量增加的速度，那麼單位商品的價格就將上升；反之，單位商品的價格就將下降。然而，凱恩斯等干預主義者卻認為，貨幣數量與物價之間的變動關係並非如此簡單。且不說有效需求並不一定與貨幣數量等比例發生變化，在即使有效需求與貨幣數量發生了等比例變化並由此導致商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貨幣數量的變化也並非一定會引起物價的變化。凱恩斯指出，在“假設進入邊際成本的不同生產要素所得報酬都以相同的比例變動，也就是說，都隨工資單位變動作相同比例的變動”，以及“假設設備與技術不變”的前提下，一般物價水準將一部分由工資單位所決定，一部分由就業量所決定。在進一步“假設所有閒置資源都是相同的，而且在進行生產時可以相互替代使用，同時又具有相同的效率”，以及“假設進入邊際成本中的各生產要素，只要尚未全部利用，便不會要求增加貨幣工資”的條件下，只要存在任何失業現象，貨幣數量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就只會導致就業量的增加，而不會對物價有任何影響。<sup>77</sup> 但只要實行了充分就業，伴隨著貨幣數量增加造成的有效需求增加而來的，就將是



工資成本和物價的增加。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們才“達到了可以被稱為真正通貨膨脹的狀態”。在這之前，由於這樣那樣的一些原因，即使物價有所上升，也不是真正的通貨膨脹。因此，我們可以說：“只要存在著失業現象，就業量會和貨幣數量作出相同比例的變動，當達到充分就業時，價格水準會和貨幣數量作出相同比例的變動。”<sup>78</sup> 漢森也明確地說：“總物價水準的變動主要是由貨幣數量的變化所決定”這種說法“部分的是過分簡化，部分的是局部真理，還有部分則是完全錯誤的”；“總價格水準的變動主要地是由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的總支出水準的變動所決定的這種說法，也許更接近於真理。”但即使如此，總價格水準和總支出水準之間也不存在直接的關係：“在存在失業和未利用資源的條件下，總支出量的變化主要地是影響產量，而幾乎不影響價格；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總支出量的增加將反映在價格的普遍上升上。”<sup>79</sup>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既使出現了通貨膨脹也不可怕，因為溫和的通貨膨脹不僅不會給經濟社會運行帶來較大的破壞，而且還有助於經濟的增長。所謂溫和的通貨膨脹，指的是產量的增長落後于物價增長時出現的物價溫和上漲這樣一種情況，其對立面是凱恩斯所謂“真正的通貨膨脹”，或漢森所謂“純粹的通貨膨脹”，即產量並無任何顯著增長時物價明顯上漲這樣一種情況。<sup>80</sup> “真正的通貨膨脹”或“純粹的通貨膨脹”是有害的、應該儘量加以避免的。但溫和的通貨膨脹則不但對我們無害，而且還是經濟增長所必需的。對於這一點，漢森解釋說：“一般而言，我們可以確定這樣一種觀點：在沒有貨幣供給的某種增加的條件下，國民收入不能有效地和以最有利的方式增加。在某些條件下，國民收入的增加伴隨著一個較小比例的貨幣量的增加可能是有利的和合意的；[而]在另一些條件下，可能伴隨著一個比國民收入增加的比例更大的貨幣量的增加。”後一種情況



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考慮到供給和成本因素，除非貨幣收入的增加快於實際收入，否則就業和產量的擴張不能（在沒有嚴重的摩擦和近乎是在難以逾越的障礙的情況下）在一個市場經濟中輕而易舉地產生。”當然，如果相對於產量來說，貨幣收入增加得十分迅速，那麼結果將是“扭曲和混亂”。但“隨著情況的變化，存在某種相對於實際收入的最優貨幣收入增長率，這種增長率能最好地促進就業和生產率。”更具體一點說，擴張一般是由私人投資和政府支出的增加所引起，而無論是私人投資還是政府支出的增加都可能需要向銀行借款（對政府而言，雖然也可以通過增加稅收或向公眾借款來增加支出，但政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往往不能立刻從稅收或公眾借款中籌集，尤其是當收入處於一個低水準時，增加稅收或向公眾借款是不容易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實現的籌款方式就是向銀行借款）。銀行可能是將公眾存儲在銀行裏的閒散現金餘額借貸給政府或私人投資者，但這一般會引起利率或多或少的上升，而利率的任何增加又都將會或多或少地對投資和消費有一個阻抑效應。“因此除非增加貨幣供給，否則一般地對私人投資或政府貸款支出增加的完全杠杆效應不可能產生。”<sup>81</sup>而在產量還沒有來得及上升的情況下，新增的貨幣就可能引起物價的上升。因此，“發展迅速的年代，通常也是物價溫和上漲的年代。在通常的情況下，價格制度對於迅速擴張的反應狀態，往往就是這樣的。”“如果批發價格和消費品價格沒有一些溫和的上漲，我們大概是不能有任何近似我們力所能及的發展的。”<sup>82</sup>

基於這種觀點，漢森批評了那種盲目固守物價穩定政策的立場，指出“恐怕我們有把嚴格的物價穩定當作神物的重大危險。這種被崇拜的神物很容易成爲最適度發展和擴張的嚴重障礙。如果每次的物價微漲都把我们嚇得倒退，我們就會遠遠落後於可能達到的發展。”<sup>83</sup>“我們想成長和擴張，但我們不願意知道這會帶



來通貨膨脹的壓力。”<sup>84</sup> 漢森指責說人們已經把“通貨膨脹”這個名詞用得過濫了，“既用它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天文數字式的物價上漲，又把它用在美國史上的比較溫和的物價上漲。至於‘通貨膨脹壓力’這一片語，我覺得往往變成實際上與‘擴張力量’無異的同義詞。因此，就應用了各種的抑制手段，爲了嚴格的物價穩定竟犧牲了產量。”<sup>85</sup> 漢森還批評說，經濟學家一般容易誇大溫和的物價上漲的弊害，有人說通貨膨脹會把人們的儲蓄吞沒掉，還有的人則說通貨膨脹會消滅中產階級，會把收入集中到少數人手裏等等，而實際上，這只是在巨大的天文數字式的通貨膨脹中才會發生的事情。在溫和的通貨膨脹中，這種事情一般不會出現，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都能夠證實這一點。其實，事情正好相反，“吞蝕家庭儲蓄最厲害的，莫過於通貨收縮和失業。”“如果爲了追求嚴格的物價穩定，我們容忍甚或促成相當大量的失業，那我們就將無從獲得我們力所能及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能隨波逐流逐漸陷入停滯的狀態。”<sup>86</sup>

哈耶克曾經舉過一些數字來表明通貨膨脹將如何將人們的儲蓄貶值，漢森也用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實際資料來表明溫和的通貨膨脹並不會將人們的儲蓄化爲烏有。他指出，在二十世紀的頭兩個25年中，“我們誠然經歷了相當大的物價巨變，但……每一家庭的儲蓄額（根據物價影響修正後）已是1925年的兩倍以上；城市自置住宅從45%增加到55%；自耕農場聰8%增加到75%。中產階級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即使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經歷的相當大的物價上漲，也並沒有使家庭儲蓄一掃而空。根據住宅放款銀行董事會的材料，每一家庭在人壽保險、儲蓄存款、美國儲蓄公債以及在各種儲蓄和接待組織中所積累的儲蓄總額，從1944年的2500元增爲1954年的4200元，代表著10%的實際購買力的增加（計算數字已按消費品物價變動調整）。”<sup>87</sup>





漢森等干預主義者對通貨膨脹（尤其是“溫和的通貨膨脹”）所做的上述辯護，在西方頗有影響。不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一批被稱為“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如盧卡斯等，又從“理性預期”假設出發，對干預主義者關於通貨膨脹會推動經濟增長的看法給予了批評。盧卡斯認為，企業家主要是根據自己生產的商品的相對價格運動（即自己生產的商品在價格上相對於其他商品價格所發生的變化）來調整其產量的：當（也只有當）自產商品的相對價格上升了時，企業家就會（也才會）擴大生產，因為自產商品相對價格的上升意味着市場總需求發生了有利於自產商品的變化（對自產商品的需求比例擴大了）；反之，當（也只有當）自產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時，企業家就會（也才會）縮小生產，因為這也意味着市場總需求發生了不利於自產商品的變化（對自產商品的需求比例縮小了）。一般價格（即所有商品的價格）的變化並不會對企業生產發生影響，因為這只是意味着貨幣數量或收入/支出的普遍增加，而市場總需求的結構（對市場上各種商品的需求比例）並未發生變化。不過，由於企業家並不能夠及時掌握一般價格的變化，當後一種情況發生時，企業家經常會誤以為是自己商品的相對價格發生了變化，從而作出相應的生產行為。譬如，當貨幣數量或收入/支出普遍增加，商品價格普遍上升時，企業家可能會誤以為只是自己商品的價格發生了上升而擴大產量。結果，從表面上看，貨幣數量或收入/支出的普遍增加刺激了經濟的增長。但企業家們遲早是會認識到真相的。一旦企業家認識到相對價格並沒有變化，他們就會停止生產的擴張甚至使生產回到原來的規模上。因此，通貨膨脹並不會導致真正穩定、長期的經濟增長。

對於米塞斯、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學者與凱恩斯、漢森等凱恩斯主義者之間就通貨膨脹問題所發生的上述爭論，我們該如何看待？我們有無可靠的辦法來對他們之間的爭議作出一個公正無誤的裁決？我覺得答案仍然是：沒有辦法。



第一，貨幣供應數量的增加是否會引起物價上升？對於這個問題，奧地利學派學者的回答是“會”，凱恩斯主義者則認為在“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答案應該是“不會”，只有在“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已被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答案才應該是“會”。那為什麼在“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答案應該是“不會”呢？凱恩斯派學者的回答是：在“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情況下，當發現貨幣供應數量（或更準確地說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的總支出量）有了增加時，企業家們一般不會用提高商品價格而是會用擴大商品產量的辦法來加以應對。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那麼凱恩斯等人對“貨幣供應數量的增加是否會引起物價上升”這一問題的回答應該就是正確的；反之就是不正確的。問題正在於：企業家們真的是按凱恩斯等人所說的這種方式行事嗎？就像我們前面所遭遇的很多問題一樣，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恐怕也難以得出一個唯一的答案。假如我們去對企業家們的行為進行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在某些時間、空間裏，企業家們的行為可能是與凱恩斯的說法相一致的；而在另一些時間、空間裏，企業家們的行為則可能是與凱恩斯的說法不一致的甚至相反的。因此，對於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要想就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學派在這一問題上的說法作出一個唯一“正確”的選擇恐怕是不可能的。

第二，溫和的通貨膨脹是經濟增長所必需的嗎？干預主義者傾向於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自由主義者則傾向於對這個問題作出否定的回答。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貨幣數量的多少與產品和勞務供給的增減兩者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任何一個數量的貨幣都可以和任何一個數量的產品及勞務供給相匹配，變化的只是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格而已。影響產量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勞動生產率。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量逐漸增加，如果貨幣數量沒有同時增加，在貨幣流通速度不變的情況下，產品的價格



將會下降，單位貨幣的購買力將會增加，經濟過程並不會由於貨幣供應不足而發生困難。因此，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以溫和的通貨膨脹為前提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不僅如此，溫和的通貨膨脹還始終存在著進一步惡化成為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哈耶克指出：

“所有人為操縱的通貨膨脹，都具有自我加速的機制。貨幣量的增加最初之所以會具有普遍的刺激作用，只能歸因於下面的事實：人們會突然發現，價格、因而利潤都高於預期。每項投資冒險都成功了，甚至包括某些本應該失敗的項目。但這只有在人們沒有普遍地預期到價格將持續上漲時才會有效。一旦人們學會了如何計算價格上漲的幅度，那時，即使是價格以同一速度持續上漲，也不可能再發揮出最初的那種刺激作用。於是，貨幣政策面臨著一種難堪的進退兩難困境。為了維持溫和的通貨膨脹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活躍程度，貨幣當局不得不加速通貨膨脹率，並且不得不一次比一次的增加幅度更大，以使通貨膨脹率能夠壓過人們的預期。如果貨幣政策不能做到這一點，要麼停止加速，要麼完全放棄通貨膨脹政策，則經濟就將處於比這一過程啟動之前更糟糕的境地。”<sup>88</sup>

第三，通貨膨脹是否會有助於經濟增長？干預主義者（如漢森等人）認為會，自由主義者（如盧卡斯等人）則認為不會。盧卡斯等人認為不會的理由主要是企業家只會在自產商品的相對價格出現上升時去增加生產，而通貨膨脹往往都會導致一般價格（而非某個或某些商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只有在企業家不瞭解一般價格的變化情況而誤以為只有自產商品價格在上漲時他才會增加生產，一旦他發現了真相後就會停止增加生產甚至使生產恢復到原來水準。不過，從盧卡斯等人的說法中實際上也可以做出這樣一種推論，即：儘管每一次的通貨膨脹導致的可能都是一般價格水準的上升，但由於單個的企業家在開始的時候都無法掌握一般價格的變化情況（而且在存在市場競爭的情況下他也不能等



到掌握了一般價格的變化後再做決策，否則在如果價格上升真是相對價格上升而非一般價格上升時他將因在調整產量方面落後於競爭者而錯失良機），因此他通常都將把它當作相對價格上升來看待，從而作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產的決策；如果這是每一次通貨膨脹都可能引發的反應，那麼通貨膨脹就事實上就可能有（儘管可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經濟增長的效果。若這一推論可以成立，那麼漢森等人關於通貨膨脹有助於經濟增長的說法似乎又是有一定道理的了。當然，每一次的通貨膨脹所引發的經濟增長程度到底會有多大，則取決於企業家們從不清楚一般價格運動的狀況到弄清楚這一狀況所延續的時間長短，以及在這期間企業家們決定增加產量時的審慎程度：如果延續時間較長，審慎程度較低，則引發的經濟增長程度就可能較高；反之則就可能較低（從理論上說乃至可以達到忽略不計的地步，假如延續時間甚短、審慎程度很高的話）。

這樣，我們看到，對於政府等市場外部力量的干預是否會引起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是否是一種可怕的經濟社會現象這一問題，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之間同樣是勝負難分。我們既無法對哈耶克和漢森所引相關資料的真假性作出明辨，也無法對通貨膨脹的可取性、合理性作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唯一判斷。

綜上所述，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所做的闡釋和論證方面，我們發現：

1. 從理論邏輯方面來看，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之間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市場自我調節是否有效”這一主題上：自由主義者堅持在沒有外部干預的情況下市場能夠有效地進行自我調節，干預主義者則堅持市場無法有效地進行自我調節。對雙方理論邏輯的分析表明，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干預主義者的看法在特定條件下都可能成立，但在另外的條件下則都可能不成立。因



此，我們既難以對它們籠統地加以否定，也難以對它們籠統地加以肯定。

2. 從經驗事實方面來看，美國自1854年至2009年間歷次經濟危機的有關資料（尤其是1945年前後的資料對比）似乎表明，在緩解經濟週期方面，干預主義政策是完全有效的；然而，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對這同一批資料做出與此完全相反的解釋，即：干預主義政策在緩解經濟危機方面所起到的這種效果僅僅只是表面上的；在這些表面效果之下，存在的則可能是不當投資的一次次累積、資源的一次次浪費，以及合理利用這些資源的機會一次次喪失。在這兩種解釋當中我們到底應該做何種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受何種話語系統的引導和約束。單純的經驗事實本身並不能告訴我們任何可靠的資訊。

3. 從政策後果方面來看，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之間的發生的一個重要爭論集中在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干預是否會導致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是否可欲這樣一些問題上。對於這些問題，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政府干預會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不僅不為經濟增長所必須，或不會刺激經濟增長，而且還會導致一系列不良的經濟社會後果。反之，干預主義者則堅持認為在生產資源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政府干預所造成的貨幣或信貸擴張不會導致通貨膨脹，而且即使發生了通貨膨脹，只要這種膨脹屬於“溫和”的膨脹，那麼就既不會給經濟社會生活帶來什麼嚴重的不良後過，而且還為經濟增長所必需，或會有助於經濟增長。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這兩種不同看法的“正誤”，我們其實也沒有辦法來加以終極性的甄別。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應該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正像我們在週期性經濟危機誘發原因問題上所面臨的情形一樣，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對週期性經濟危機應對策略所做的闡釋孰是孰非這一問題上，我們同樣也無法作出唯一的、終極的判斷。無論是自由主





義還是干預主義，都有可能是應對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恰當策略，只要市場體系確實處在它們各自的理論分析所預設的那種情形之下。籠統地肯定其中的一種理論立場而排斥另外一種理論立場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 三 結語

回到我們在文章開頭所提的那個問題：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等可以用來解釋和應對“大蕭條”的不同理論系統當中，到底哪一種更為合理或更為可取呢？

綜合本文上面的分析，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在“大蕭條”的解釋和應對方面，雖然“消費不足論”的確不是唯一的理論話語；在“消費不足論”之外的確存在著其他一些理論話語，如“投資不足論”、“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等，但無論是從經驗事實、從邏輯推理，還是從語義分析方面看，對於這些不同說法之間的真假、對錯，我們的確並無可靠的途徑與方式來加以終極性的甄別和判斷。

對於不同理論話語之間的真假、對錯，我們為什麼會難以作出一個終極性的甄別和判斷？結合本文所做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對不同理論話語之間的真假、對錯之所以難以作出一個終極性的甄別和判斷，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經驗陳述的非唯一性。科學論斷必須以“事實”為依據，這似乎是人們的一種共識。然而，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相關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樣，問題恰恰在於，在很多時候我們會驚訝地發現我們所需要的有關“事實”並非像我們通常以為的那樣明確無誤。對於我們進行科學論斷所需要的某一“事實”，很可能存在著非常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一些陳述。譬如，對於1929年經濟“大蕭



條”爆發之前的若干年裏美國是否存在著“消費不足”的現象（或者說1929年經濟“大蕭條”爆發之前的若干年裏美國居民消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否有下降的趨勢）這一問題，我們所得到的有關“事實”的經驗陳述在內容上是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吉伯特.C.賴特、吉姆.E.裏斯、斯塔夫裏阿諾斯、狄克遜—韋克特、傑瑞米—阿塔克和彼得—帕塞爾、McElvaine、胡國成等人提供或引用的資料表明“大蕭條”爆發之前的若干年裏美國存在著“消費不足”的現象，而小福爾索姆、漢森、彼得-特明等人引用的資料卻表明“大蕭條”爆發之前的若干年裏美國根本不存在著“消費不足”的現象<sup>89</sup>。按照人們通常持有的觀點，這些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經驗陳述不可能同時為“真”，它們當中只能有一個是“真”的或相對最為“真”的，其他的陳述則一定是“假”的或相對為“假”的。因此，我們必須要在這些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陳述當中選擇出一個可以確認為“真”或相對為“真”的陳述來作為我們進行科學論斷的“事實”依據。然而，困難正在於，我們發現，至少到目前為止，人們並沒有能力以一種純粹“客觀”的態度來進行這樣一種選擇。為了進行“科學論斷”，人們必須在這些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事實”陳述當中進行選擇，但人們在進行這種選擇時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他所屬的話語系統的約束和引導。只有在某種特定話語系統的約束和引導下，這種選擇才有可能。例如，在“消費不足論”的約束和引導下，我們就可能作出羅斯福等人所作出的那種選擇；而在“投資不足論”或其他話語系統的約束和引導下，我們就可能作出與羅斯福等人相反的選擇。由此可見，並不存在著完全脫離特定的話語系統而獨立存在的“自然事實”。所有的“事實”都只是人們在特定話語系統的約束和引導下選擇性建構的產物。既然如此，當我們試圖以某種或某些所謂的“事實”為據來對某一理論或話語的“真”、“偽”進行



檢驗時，我們就陷入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這些“事實”本身就是特定理論或話語系統建構的產物（而非純粹自然的“事實”），它們何以能夠反過來成為我們用以判斷、檢驗理論或話語系統之“真”、“偽”的依據呢？

其實，這並不僅僅只是在有關“大蕭條”的研究或社會科學研究中才會出現的情況。科學哲學的研究早就表明，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所謂脫離開解釋而獨自存在的純粹自然的“事實”也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任何一件“事實”也都是人們“解釋”的結果。而“解釋”是依賴於“理論”的：所由出發的“理論”不同，解釋出來的“事實”也就不同。因此，試圖通過發現其中哪一種理論能夠獲得更多相關“事實”的支持來判斷哪一種理論更為可取，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中也是一種沒有意義的做法。

2. 理論解釋的非唯一性。科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要對“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作出論斷，用其中的一個或一些“事實”來解釋另一個或一些“事實”的產生和變化。但由於以下一些原因的存在，這一任務的完成也具有相當的艱巨性。

首先，社會現實中各種現象之間可能都同時具高度的相關性，而我們又幾乎沒有能力來對這些同時具有高度相關性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作出確切無誤的最終判斷。例如，按照伯南特等人總結的有關經濟週期的一些“典型事實”，本文所討論的上述四種理論系統所提用來解釋經濟週期現象的關鍵因素，如“消費”、“投資”、“貨幣變數”等其變化態勢均與GDP的變化態勢都高度一致。那麼，這幾種因素當中到底哪一種或幾種與GDP的變化態勢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呢？是只有其中一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了GDP的變化呢，還是它們都對GDP的變化產生了影響呢？如果只有其中一種因素的變化導致了GDP的變化，那麼又是其中的哪一種呢？對於回答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幾乎無能為



力。我們只能說，在對有據可查的絕大多數經濟週期進行解釋方面，上述四種學說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所需“事實”依據的支持，都有一定效力。

有人可能會說，在當今社會科學界，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已經使我們有可能借助於統計分析（如詳盡分析、多元回歸分析或路徑分析等）的方法來確定不同統計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對於這種看法，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等幾代奧地利學派學者早就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米塞斯明確認為，由於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是各種因素複雜作用的結果，而在社會科學中又無法像在自然科學中那樣利用實驗的方法來將可能導致事物發生變化的各種因素分離出來單獨進行觀察，因而也就很難單純以經驗事實為依據來“為任何一種結果找到其充分的原因。”<sup>90</sup> 羅斯巴德也同樣明確地對此觀點加以重申：“我認為，經濟學理論不能用歷史上的或統計上的事實加以‘檢驗’。這些歷史事實非常複雜，科學實驗中的物理事實可以被隔離，而歷史事實卻是不可控制的，所以它們不能用來‘檢驗’理論。許多誘因總是聯繫在一起的，這樣才形成了歷史事實。成因理論對於這些歷史事實來說是先驗的，只有它可以用來分離和查明各種原因是否產生了作用。”<sup>91</sup>

在運用統計分析技術來確定現象之間因果關係的方法中，兩種被確認為具有相關關係的現象之間是否同時還具有前後相繼的時間序列關係，被認為是進一步判定它們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的關鍵因素。兩種具有相關關係的現象之間如果同時還具有時間序列上的前後相繼關係，那麼就可以被確定為具有因果關係，反之則不然。然而，下面的例子可以表明，既具有高度的相關關係同時又具有前後相繼之時間序列關係的兩種現象之間並不必然就會具有因果關係。例如，假如我們對閃電和雷聲這兩種現象的觀察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採用詳盡分析、路徑分析等因果分析模式），我們會發現這兩種現象之間不僅存在著高度的相



關性，而且還有著嚴格的前後相繼性。但我們今天公認閃電和雷聲之間毫無因果關係，它們都只是雲團摩擦時正負電子碰撞這一現象的結果而已。至於為什麼我們會將“雲團摩擦時正負電子碰撞這一現象”（而不是別的什麼現象）確認為是“閃電”和“雷聲”這兩種現象的原因，則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已有物理學理論命題（如“正負電子碰撞會產生電流和聲音”、“光的傳播速度要比聲音的傳播速度更快”等）為依據展開的演繹推理而不是統計驗證。已有的物理學命題不同，以此為依據展開演繹推理後所得到的（對“閃電”、“雷聲”等現象間因果關係）解釋也就會不同。因此，和“事實”的選擇依賴於話語系統的歸屬一樣，對不同“解釋”的選擇同樣也依賴於話語系統的歸屬。在不同的因果“解釋”面前，從屬於不同話語系統的人會作出不同的選擇。

此外，對於“相繼關係”的判斷也會是一個問題。雖然說“相繼關係”意味着兩種現象的出現在時間上必須有“前”、“後”之別，但“前”、“後”之間的時間差異到底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才可以被我們認為是屬於“相繼關係”？在物理學研究中對時間的觀察也許可以達到一個非常精確的地步，然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現象變化時間的觀察往往是非常粗糙的，經常是以年、月、周等為單位。這樣，許多本來可能具有“相繼關係”的現象其相繼性就可能由於時間統計方面的粗糙性而被抹煞。譬如，當統計資料是以“年”為單位來進行時（正如我們這裏所引用的這些資料一樣），“前”、“後”相差幾個月的時間序列關係就完全可能沒有被統計出來。因此，許多在以“年”為單位進行的統計資料中被認為是同時出現的兩個資料，其實很可能是存在著相繼關係的，只是沒有被統計資料反映出來罷了。

理論解釋之所以具有非唯一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現實本身缺乏嚴格的規律性。也正如米塞斯所說的那樣，在社會科學所處理的那些變數之間不存在著固定不變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科





學中，各種定理（如物理學定理）在時空適用範圍方面雖然也存在著一定的限制，但它們的適應範圍畢竟還是比較長遠和寬泛。而在社會科學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超出特定時間、空間範圍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家們所總結出來的任一命題可能都只是對已經過去了的特定情景條件下某些人類行為特徵的描述而已，它並不具有物理定理那樣的普適性。例如，凱恩斯認為引發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嚴重喪失以至於投資需求長時間內無法恢復到正常水準。對於凱恩斯提出的這一命題，即使能夠通過某一次或幾次的“事實”檢驗，我們也無法確保它具有在任何時候都有效的普適性。更為可信的看法是：此時此地發生的經濟蕭條或許多數如凱恩斯所說主要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過渡喪失引起投資需求長時期無法恢復所致，但彼時彼地發生的經濟蕭條卻很可能是由於其他因素造成的。

最後，在本文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也看到，即使是面對著“確切的”資料，我們對這些資料的解釋也可以是非唯一性的。例如，按照庫茲涅茨提供的數據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在1919年—1935年間，美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投資支出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兩項指標的年度變化同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度變化之間都存在高度的相關性，而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度變動狀況與消費支出年度變動狀況之間的相關性，比與資本形成年度變動狀況之間的相關性，似乎要更高一些。這似乎表明國民生產總值的波動在相對更大的程度上是由消費支出的變化所決定的。可是面對這同樣的數據資料，漢森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一種解釋。以凱恩斯主義理論為指引，漢森提出了這樣一種獨特的看法，即：投資需求的變化往往先於消費支出的變化（或者說消費支出的變化往往滯後於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的變化），庫茲涅茨資料中投資需求（或資本形成）年度波動趨勢同國民生產總值年度變化之間的相關性與消費支出年度波動趨勢同國民生產



總值年度變化之間的相關性兩者之間出現的上述差異，正是這一規律的結果。經過漢森的這樣一種解釋，庫茲涅茨資料就不僅不再顯得與“投資不足論”有所衝突，反而還成了“投資不足論”的有力證據。可見，在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面對同一個（或一組）大家共同確認的統計資料（或經驗資料），對於這一個（或一組）統計資料（或經驗資料）的意義，人們便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正如米塞斯所指出的那樣：“社會科學不能利用經驗來證實其觀點。社會科學所研究的每個事實和經驗都可有無數種解釋。”<sup>92</sup> “同樣的事實，同樣的統計數字，可以被用來證實相互矛盾的理論。”<sup>93</sup>

3. 辭彙含義的非唯一性。無論是科學研究還是日常談話都必須借助於一定的概念辭彙來進行。可是，我們卻經常會發現，無論是在科學研究過程中還是在日常會話過程中，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辭彙，在不同的言說者那裏卻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含義。如本文前面所做相關分析中涉及的“自由主義”、“干預主義”、“經濟復蘇”等辭彙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辭彙，雖然為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們所共同使用，但這些隸屬於不同話語系統的寫作者或言說者們在使用這些辭彙的時候各自享領的含義和外延是不一樣的。而這種“不一樣”，正是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話語之間存在差異的重要根源。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們各自的理論解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與他們所用概念辭彙的特定含義相聯繫，是以這些概念辭彙的特定含義為前提的。當然，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話語之間在概念方面的差異並不限於以上這些。除了上述這些辭彙之外，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瞭解到自由主義者和干預主義者們之間在概念辭彙方面所存在的諸多差異。限於篇幅，我們在這裏不再細述。

概而言之，即使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我們所需要的經驗資料、我們對這些資料所做出的理論解釋以及我們進行理論解釋時



所使用的概念含義也都具有非唯一性或多元性。如上所述，這種非唯一性或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從事研究所需要的經驗資料、我們對這些資料所做出的理論解釋以及我們進行理論解釋時所使用的概念含義對特定話語系統的依賴性所造成的。消除這種非唯一性是人類長期以來的追求，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以及在可見的未來，這種追求並沒有值得炫耀的結果。至少到目前為止及在可見的未來，人們都只能在特定話語系統的範圍之內來獲得這種唯一性和確定性，其結果就是這種唯一性和確定性也只是在特定的話語系統之下才有效。在不同的話語系統之間，我們就只能接受上述非唯一性或多元性。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及在可見的未來，所有的唯一性和確定性（或者更通俗地說：所有能夠以唯一和確定無疑的方式來加以陳述的“現實”）都只是一種話語的建構，而非純粹“給定的實在”本身。

假如我們所做的這些分析及其結論是可以接受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比結束《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一文的分析時更有信心地宣稱：

1. 二十世紀前期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普遍出現的干預主義轉向的確確很可能並不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只是人們在特定話語系統（在凱恩斯主義誕生之前主要是“消費不足論”這種話語系統，在凱恩斯主義誕生之後則主要是凱恩斯主義這種話語系統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干預主義話語系統）的引導和約束下建構出來的一種社會歷史過程。<sup>94</sup>

2. 就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種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或戰略而言，相互之間並無所謂絕對的真假、對錯之分，每一種政策或戰略都有自己的“事實”依據、“解釋”邏輯和“概念”前提，但這些“事實”依據、“解釋”邏輯和“概念”前提都只有在自己那特定的話語系統之下才能夠成立，否則就都可能受到



質疑。而對於這些不同話語系統本身的“真”、“假”、“對”、“錯”，我們並無一公認可靠的方法來對其作出絕對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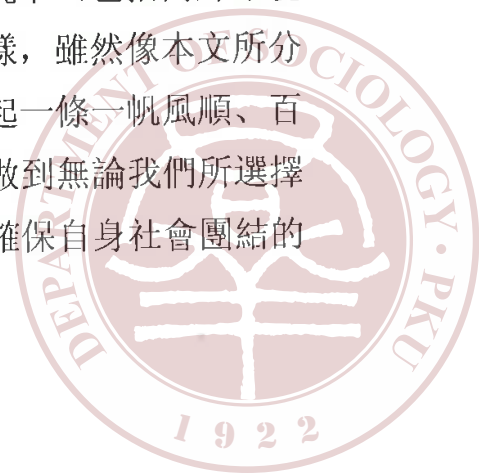
此外，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種政策或戰略或許都有自己適用的情境（同時也都有自己不適用的情境）。關鍵的問題是，第一，正像米塞斯指出過的那樣，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由於沒有普遍性的規律存在，因而也就沒有普遍適用的理論或行動策略存在；每一種理論可能都只是描述了某些特殊情境下的特殊現象。同時，第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缺乏足夠的資訊來幫助我們判斷我們正處於何種理論所適用的情境之下。換句話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其實都是處於一種盲目（因而茫然）的處境之中。在這樣一種盲目因而茫然的處境之中，我們對於自己要做的行動抉擇之“正誤”、“對錯”也不可能有明確無誤的判斷。因此，

3. 在特定的時間、空間裏，以及在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種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或戰略之間，人們到底應該或將要實行何種發展政策或戰略，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取決於什麼“歷史的必然性”，而更可能是取決於政體與民意，取決於上述各種話語系統當中何種在決策者以及能夠左右決策者的社會力量當中佔據主導地位。

本文和《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一文均緣起于作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社會發展戰略：國際比較及其啟示”中所做的研究工作（兩文均是作為這一課題的結題報告而撰寫的）。該課題立項的初衷，是要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戰略的比較研究，歸納概括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為正處於“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中國大陸在制定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時提供一些可資參考借鑒的意見或建議。遺憾的是，



本文（本研究）沒有能夠實現這樣一個初衷。正如讀者已經看到的那樣，通過自己的上述研究，本文作者不僅沒有能夠為正處於“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中國大陸在制定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時提供一些明確無誤的參考意見或建議，恰恰相反，本文作者還讓自己（同時也可能讓本文的諸多讀者）陷入了一種至少在短期內難以解脫的困惑之中，即：至少就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種不同的話語系統及其發展戰略而言，我們沒有能力對它們的是非對錯作出確鑿無疑的明確判斷。或許，在未來的時間裏，通過自己進一步的探索，或者在某些睿智者的啟發教誨下，作者將能夠擺脫這樣一種困惑。但至少在目前，我們（也可能只是本文作者自己一人）唯一可以確定的似乎就是：怎樣都行。而對此唯一需要立即加以補充的一點就是：只要絕大多數人民對這一發展戰略表示同意，並在分享這一發展戰略可能為自己帶來的各種利益的同時，也願意承擔由這一發展戰略可能帶來的任何風險和痛苦。而這也就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政策的決策機制提出了如下這樣一個基本要求，即：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過程中，無論採用何種具體方式，都應該讓廣大人民群眾得以參與其中，以使最終確立的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能夠切實有效地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的意願和決心。因為只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廣大人民群眾才可能心甘情願的承擔既定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可能帶來的任何責任、風險和痛苦，而不將其簡單地推諉給政府、專家一類的少數“他者”。“同舟共濟”、“同甘共苦”一類的言辭才能夠成為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社會的團結才有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內外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都得到較高程度的保證。這樣，雖然像本文所分析的那樣，我們可能無法準確地判斷和確立起一條一帆風順、百分百“正確”的發展道路，但我們卻有可能做到無論我們所選擇的發展道路有什麼不適當之處，我們都能夠確保自身社會團結的





穩定存在。這或許就是我們從本文前面的分析當中可以引申出來的一個重要結論。

## 注釋

- 1 見《社會理論學報》2010年秋季號，273–338。
- 2 轉引自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余江濤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264–265。
- 3 表中數據來源於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 1919–1935*, Appendix Table VIII,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7), 85.
- 4 表中數據來源於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 1919–1935*, Appendix Table VIII,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7), 85.
- 5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41), 49.
- 6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49–50.
- 7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50.
- 8 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要指出，漢森上述分析的貌似有理並不能證明上述與其相反的分析就完全是錯誤的、不能成立的。在上述漢森的分析 and 與其完全相反的分析之間，何種分析更為可取，單從這兩種分析本身並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而是取決於我們皈依何種話語系統。如果我們皈依於凱恩斯主義一類的“投資不足論”話語，那麼漢森的分析顯然就是更為可取的；反之，如果我們皈依於“消費不足論”一類的話語，那麼上述與其相反的分析就是更為可取的。
- 9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148。
- 10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49。
- 11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49。
- 12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77。
- 13 資料采自密爾頓－弗裏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國貨幣史》，巴曙松、王勁松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508–515。
- 14 例如，弗裏德曼曾經提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因素是1930年代的銀行恐慌及隨後美聯儲的不當應對所引致的貨幣緊縮。雖然在蕭條期間也存在著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大幅下降的情況，但按照弗裏德曼的分析，這些需



求的下降主要是由貨幣緊縮所引起。換句話說，在貨幣緊縮和需求下降兩者之間，前者是因，後者是果。然而，特明卻通過相關經驗資料所進行的仔細分析得出了相反的結論。通過將弗裏德曼等人的理論與實際資料相對照，特明發現，並無任何證據表明在1929-1930年上半年這段對於大蕭條的發展來說最為關鍵的時間段裏，貨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銀行恐慌本身是由經濟不景氣導致的，而貨幣存量隨後的下降也完全可以解釋為是人們對貨幣需求減少的結果。見 Peter Temin,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6).

- 15 伯南克，《大蕭條》，宋芳秀、蔻文紅譯（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序言，3。
- 16 伯南克：《大蕭條》，序言，3。
- 17 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82。
- 18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李鳳聖等譯（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165-166。
- 19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我們要對“消費不足論”的作用全盤加以否定。說“消費不足論”在邏輯上有不嚴密之處，並不等於說它就毫無可取之處。我們上面所指出的，僅僅是“消費不足”（包括嚴重的消費不足）現象不一定會必然引發現代經濟危機的幾種情況，但這並不能夠讓我們反過來得出結論說，在任何情況下，“消費不足”現象都必然不會引發以生產過剩為特徵的現代經濟危機，在任何情況下“消費不足”現象都不可能成為引發現代經濟危機的原因。相反，上面的分析也正好從反面告訴我們，在上述幾種情形所指出的特殊條件（如技術進步）不存在的情況下，“消費不足”現象的還是可能成為引發現代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的。在這種情況下，想方設法提升購買力或消費水準也就有可能成為緩解或消除經濟危機的一種主要政策手段。

我們以“技術進步”因素的缺失為例並借助於前面西斯蒙第曾經舉過的例子來對此加以說明：設在西斯蒙第假想的布廠裏有100個工人，年生產1萬歐納布匹，每個工人每年掙300法郎，工人的收入達到3萬法郎；企業擁有的資本為10萬法郎，利潤率為15%，由工廠主和資本家共同佔有的企業利潤即為1萬5千法郎。假如收入完全被消費，那麼工人和工廠主、資本家三者合計擁有4萬5千法郎的消費量。

十年以後，在同一個工廠裏，工人增加到200個，生產因而也擴大了1倍，年生產2萬歐納同樣的布匹。但工人的工資被降低了，每個工人每年只掙200法郎，這樣，工人的收入和消費將只增加到4萬法郎。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情況下，企業佔用的資本增加到20萬法郎，但利潤



率也降低至12%，則工廠主和資本家共同佔有的企業利潤為2萬4千法郎。假設這些收入完全被消費，那麼工人和工廠主、資本家三者合計擁有的收入即消費量為6萬4千法郎。再假設該工廠還需要提留一部分年收入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而這部分投資所需的價值等於2萬6千法郎。這樣，該工廠的工人、廠主、資本家三者的消費量加上該廠需要用於擴大生產的投資量（需要等值的布匹去與生產投資品的工廠交換）合計為9萬法郎。假設生產該廠所需投資品的另一家工廠將把售後收入全部用來購買該廠生產的布匹以用於這家工廠的工人、廠主及資本家的消費，那麼，社會成員對該廠所產布匹的消費量也即為9萬法郎，比十年前同樣提高了1倍。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凱恩斯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布匹生產供求之間的平衡就將得以維持，經濟危機不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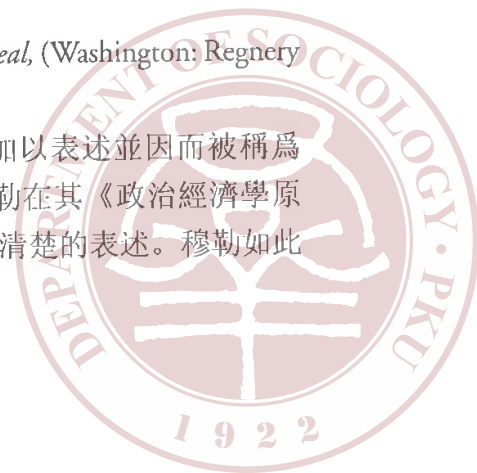
然而，假如該工廠本年度不準備進行擴大再生產，因而無須增加投資的話，或者準備進行再生產但增加的投資額度小於2萬6千法郎的話，那麼就會出現西斯蒙第所說的那種情況：生產增加了1倍，消費則只增加了0.7倍；有三成新產品的價值得不到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危機的發生就不可避免了。而危機發生的原因當然就是消費不足，而非其他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改變政策，使該廠工人的工資水準和企業利潤率與十年前一樣保持不變（即工人的工資仍為每人每年300法郎，企業利潤率仍然保持15%的水準），那麼，消費不足的情況也就會被改變（200個工人的年總收入將達到6萬法郎，工廠主和資本家的總收入將達到3萬法郎，工人、工廠主和資本家的總收入將達到9萬法郎。與十年前相比，正好也是增加了1倍，與生產增加的數量相等），消費需求就可以隨著生產供給的增長而增長，生產和消費之間維持著動態的平衡，生產過剩的情形也就將不會出現。

由此可見，在由於技術進步或其他原因（如設備集中更新）引起的投資需求小於消費不足所造成的需求空缺這種情況下，消費不足（或有效購買力不足）也是可以引發以生產過剩為特徵的經濟危機的，而想方設法提升購買力或消費水準也就有可能成為緩解或消除經濟危機的一種主要政策手段。因此，籠統地說“消費不足”不是引發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並不是一種恰當的做法。

- 20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47。
- 21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趙磊等譯（廣東經濟出版社，2010），449。
- 22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76。
- 23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76-477。
- 24 參見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第二、三章。



- 25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宋韻聲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237。
- 26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165。
- 27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167-168。
- 28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168-170。
- 29 Robbins, Lionel,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34).
- 30 Hansen, Alvin H.,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41).
- 31 弗裏德曼，密爾頓、施瓦茨，安娜.J.，《美國貨幣史》。
- 32 Temin, Peter,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6).
- 33 Gordon, Robert J. and Wilcox, James A., *Monetar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Evaluation and Critiqu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8).
- 34 Eichengreen, Barry,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terwar Gold Standar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Eichengreen, Barry,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ichengreen, Barry, and Sachs, Jeffres, "Exchange Rates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1985); Bernanke, Ben, and James, Haeold, "The Gold Standard, Def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In Hubbard, R. G., 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Cri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Temin, Peter, *Lesson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Boston: MIT Press, 1989).
- 35 Romer, Christina, "The Prewar Business Cycle Reconsidered: New Estimates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69-190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1989);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1990);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The Nation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1993).
- 36 Murphy, Robert P.,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9).
- 37 雖然這一觀點通常被認為是由薩伊首先明確地加以表述並因而被稱為“薩伊定理”，但按照凱恩斯的看法，約翰·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對這一觀點做了可能比薩伊等人更為清楚的表述。穆勒如此



表述這一觀點：“凡是用來購買商品的，只是商品。每個人所用來購買他人產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產品。就字面意義來講，所有的賣者必然是買者。假設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麼每個市場的商品供應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們的購買力也會同時增加一倍。這就是說每個人的供應量和需求量都比從前增加了一倍。每個人的購買量也會增加一倍，這是因為每個人可用以交換的東西也增加了一倍。”轉引自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5。

- 38 轉引自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479。
- 39 “競爭的結果首先就是降低工資”。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241。
- 40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42。
- 41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11-112。
- 42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08。
- 43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10。
- 44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110。
- 45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62-463。
- 46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71。
- 47 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38。
- 48 密爾頓·弗裏德曼、羅絲·弗裏德曼，《自由選擇》，68。
- 49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31。
- 50 彼得·馬賽厄斯和悉尼·波拉德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王宏偉、鐘和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574-575。
- 51 彼得·馬賽厄斯和悉尼·波拉德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八卷），576。
- 52 見密爾頓·弗裏德曼和羅斯·弗裏德曼，《自由選擇》，胡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8-28。
- 53 羅斯福，《羅斯福爐邊談話》，張愛民、馬飛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12-13。
- 54 本段幾處著重號均為本文作者所加。
- 55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43-244。
- 56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45-246。
- 57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45-246。
- 58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90。
- 59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92。
- 60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8。
- 61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02。





- 62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7。
- 63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46–47.
- 64 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張瑞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36。
- 65 吳易風等，《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總論”，22。
- 66 Alvin H. Hansen, *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 46–47.
- 67 資料來源：NBER。轉引自宋玉華等著，《世界經濟週期理論與實證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396–397。最後一行數字直接引自NBER網頁。
- 68 以上分析參見宋玉華等著，《世界經濟週期理論與實證研究》，398–403；1945年之後的相關分析依據NBER網頁新增加的2007-2009年資料做了適當調整。
- 69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75–476。
- 70 弗裏德曼在對干預主義的財政政策進行了仔細分析後明確指出，假如政府的赤字支出只是通過借款來維持，那麼由於政府借款減少了私人支出，干預主義者所期待的那種經濟擴張就可能不會出現。因此，為了能夠起到刺激經濟擴張的目的，政府只能通過增加貨幣數量的辦法來維持赤字財政，其結果就必然是通貨膨脹。參見弗裏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73–82。
- 71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100。
- 72 “信用擴張的最終結果是社會的普遍貧困。”這裏的“貧困”一詞“是在沒有信用擴張與經濟繁榮的情況下事態的發展為參照的。資本主義經濟歷史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的持續發展，資本貨物的供給的穩步增加，人民總體生活水準的不斷提高。這一進程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就算在繁榮時期內它也會大大超過與此同時不良投資和過渡消費所帶來的損失。於是總體上而言繁榮末期要比繁榮初期的經濟更加興旺。貧困只是在與人們潛在更好的滿意狀態相比時才會顯現出來。”在信用擴張引起的通貨膨脹過程中，某些個人或集團也許會受益，但“這種受益與他們自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毫無關係，而僅僅是得自於他們銷售的貨物的價格的上漲與他們購買的貨物的價格的上漲之間的時間差。但廣大人民卻要承擔起經濟繁榮時期不良投資和過渡消費所帶來的災害性後果。”
- 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462。
- 73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100。
- 74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240–241。



- 75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101。
- 76 按照弗裏德曼的說法，在貨幣數量增加的情況下，貨幣對於持有者的邊際效用將會降低，因而會刺激貨幣持有者減持貨幣而增持其他形式的財產，包括其他商品。反之，在貨幣數量減少的情況下，貨幣對於持有者的邊際效用將會上升，因而會刺激貨幣持有者增持貨幣而減持其他形式的財產，包括其他商品。
- 77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27。
- 78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28。
- 79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173。
- 80 干預主義者認為，並非物價的任何上升都屬於通貨膨脹。如果物價水準的上升等於或小於產出水準的上升幅度，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通貨膨脹。物價的這樣一種上升對經濟和社會福利不會造成任何損害。漢森明確地說：“在我們或任何其他國家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事例可以證明物價上漲已經損害了整個經濟和一般福利，如果這一時期裏的總產量的增加在百分率上超過了物價的上漲。”見漢森，《美國的經濟》，北京大學經濟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39。
- 81 漢森，《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205–206。這一點和前述弗裏德曼的相關分析基本一致。區別只在於弗裏德曼對由此引起的通貨膨脹表示憂慮，而漢森則不僅不感到憂慮而且還認為是經濟增長所必需。
- 82 漢森，《美國的經濟》，41。
- 83 漢森，《美國的經濟》，38。
- 84 漢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問題》，張伯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10。
- 85 漢森，《美國的經濟》，39。
- 86 漢森，《美國的經濟》，41–42。
- 87 漢森，《美國的經濟》，42。
- 88 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姚中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10–111。
- 89 參見謝立中，《走向干預主義：歷史之必然，還是話語之建構》一文。
- 90 米塞斯，《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5。
- 91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33。
- 92 米塞斯，《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戴忠玉、劉亞平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5。
- 93 米塞斯，《貨幣、方法與市場過程》，10。
- 94 如眾多文獻所述，在20世紀30年代，上述諸理論中至少有三種（“消費不足論”、凱恩斯主義、奧地利學派）已經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闡發並在



政府官員、知識份子、企業家以及公眾當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其中影響較大的，當是各種類型的干預主義理論：首先是以“消費不足論”為核心論點的西斯蒙第主義，之後則是以“投資不足論”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至於米塞斯等奧地利學派學者闡述的自由主義理論，儘管也有人（米塞斯、哈耶克、羅賓斯等）持明確的支持態度，但在多數人那裏，則被視為一種不當的理論而遭到了唾棄。正像羅斯巴德所描述的那樣：“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和英國有許多人對米塞斯的商業週期理論產生了興趣，但是這種興趣很快就被對‘凱恩斯革命’的狂熱沖淡了。”（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73）

